31761 08420082 3

香港
九七啟示錄

誰是首任行政首長？
解放軍駐港隱憂重重
于品海與明報唇齒相依
三大英文報紙何去何從？
香港帝國主義入侵華人社會

am
S796
7571 H72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目錄：

1 編者言
2 〝九七〞因素與兩岸三地關係
3 「禍」、「福」？

政治篇：

4 誰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
8 解放軍駐港隱憂重重？
11 揭露香港各大政黨財政來源
14 〝九七〞香港警隊面對新挑戰
16 一國兩制新說法
18 〝九七〞以後人權狀況

傳媒篇：

20 香港「文化帝國」入侵華人社會！
22 于品海與明報唇齒相依、難分難捨
24 香港三大英文報紙何去何從？
27 傳媒老闆會否轉？
29 香港各大報的編輯權誰屬？
31 香港缺乏一份老人報
32 誹謗新聞引起爭議

經濟篇：

34 香港會計師行發展中國業務
36 深圳經濟能否取替香港？

社會篇：

38 大亞灣會否受鄰近地區地震影響？
39 中港人口與生育政策不同
41 性染污在中國日趨嚴重
43 國內盲流會否入侵香港？
45 〝九七〞後香港的公衆假期如何修訂？
47 公務員學普通話熱
49 香港政府承認大陸學位問題衆說紛紜
51 鳴謝

館獻文港加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Gift from
Mr. Sung Man-Chun & Ms Chick Pui-Fong

編者言

青山依然在，幾度夕陽紅。

正所謂「月到宵殘份外明」。九七越近，因主權移交所衍生的種種問題便越見明顯。雖然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政策終告日落西山，而香港人亦將有屬於自己的國家，但香港未來幾年的政治氣侯仍是陰霾密佈：中英持續爭拗；新機場、貨櫃碼頭的財務安排未能及時解決、預委會之成立、臨時立法會之提出等，凡此莫不令港人握腕低徊、百感交集。

本期《媒介縱橫94》的主題，是環繞著九七前後香港特別行政區將可能面對的各方面轉變，作初步的探討及預測。它共分為四個部份，分別為政治篇、傳媒篇、經濟篇及社會篇。本期雜誌命名為《九七啟示錄》，即據此而來。

由於大部份內容均屬預測性文章，同學們因局限於一些客觀條件，對一些敏感問題未敢妄下判斷，幸蒙本刊顧問陳良光先生悉力協助，及多位專業人士之撥冗接受訪問、提供意見，終令本雜誌得以成篇出版。《九七啟示錄》之得以面世，他們居功至偉，同學們的全力以赴，尚屬其次。

《九七啟示錄》乃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三年級同學們的實習作業，結果理想與否尚有待讀者回應。選修「雜誌編輯學」的二十四位同學既不妄自菲薄，亦不引喻失義，且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心情期待各界高明斧正。

九七因素與兩岸三地關係

陳玉璽

當前台海兩岸關係正朝兩個互相矛盾的方向發展：一方面，經濟合作愈來愈密切，台灣輿論界大力鼓吹兩岸加強經貿來往，並建議當局開放直接通商通航。另一方面，台獨運動日趨高漲，台灣反對「一國兩制」，主張對等「政治實體」，使兩岸政治關係愈趨疏離和對立。

從國際經驗來看，經濟合作有賴於良好的政治關係；當今幾個主要經濟集團，如歐共體（現改稱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盟互惠貿易區等，都是以政治體制的同質性以及良好政治關係作為結盟的基礎。六十年代以來，因政治關係惡化而導致經濟合作崩解的事例屢見不鮮。台海兩岸若要發展經濟合作，就必須努力改善政治關係，而當前妨礙兩岸政治關係的主要因素是統獨爭議。

然而台獨運動失控導致中共動武攻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個中因由必須從台灣政經發展的內在動力去省察。首先，現階段的台獨運動已擺脫八十年代以前的體制外抗爭運動的性格，而被吸納於新的民主政治體制內，成為政黨的政治主張。這項主張能否實現，端視選民的意向而定；而中產階級佔多數的台灣選民懍於中共武力攻台，並不敢以選票支持台獨。換言之，台獨運動要受選民制約，而選民又受中國因素制約。因此，除非中國大陸出現導致國力式微，台灣宣告獨立的機會是不存在的。

其次，兩岸經濟相互依存度愈來愈高，一九九四年雙邊貿易額估計將達一百五十億美元，使大陸成為台灣的第三大出口市場，台灣成為大陸的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僅次於香港）。目前大陸外資估計有二成來自台灣，金額之大亦僅次於香港。經濟上的相互依存，使台灣難以脫離大陸獨立，而大陸亦不敢輕率對台動武，雙方必須學習以理性、和平的方法解決爭端。

但是兩岸政治統一困難重重。台灣不願接受「一國兩制」，具有歷史原因和現實政治原因。就歷史因素而言，台灣政府的統治權源自「中華民國」的「法統」，雖然改革後的政府體制已不再宣稱代表全中國，但仍維持主權國家的「中央政府」格局，除非兵臨城下，戰敗投降，否則絕不願屈居為地方政府。再就現實政治而言，台灣認為她的經濟和政治均優於大陸，如以地方政府的地位與大陸統一，台灣民眾擔心民主自由會蕩然無存。尤有進者，在台獨運動中所湧現的新國家認同意識，也使許多台灣民眾抗拒「一國兩制」。

在這種情勢下，中國若欲爭取台灣人民認同統一，和平統一方案必須因應台灣的現實而改弦更張，在政治關係上作出雙方都可接受的合理安排，否則僵局將會無限期拖延下去，時間拖得越長，台灣分離意識越強烈，兩岸統一也就更困難。

目前北京因忙於肆應香港回歸問題，無力研訂兩岸統一的新方針。筆者預料九七年後，如果中國政局穩定，北京將採取行動與台灣改善政治關係。

在台灣方面，由於經濟上的需要，未來數年將會與大陸進行一連串談判。首先，九七年以後香港回歸中國版圖，屆時台灣航機飛港、貨物經港轉運大陸以及旅客過境的問題，將使台灣拒絕「三通」的政策面臨考驗。其次，目前台灣為促進經濟發展而推出的「亞太營運中心」藍圖，乃是以大陸為腹地之綜合服務業發展計劃，若無大陸方面的合作，勢將難以開展。第三，兩岸貿易及投資的劇速發展，已滋生一系列問題，亟待雙方談判解決。第四，九七年後台灣官方及民間機構在港活動和營業的問題，也需要兩岸協商，預作安排。目前台灣在港直接或間接從事商務活動的企業，據估計多達兩千家，香港所提供的金融、運輸、保險、倉儲服務以及大陸市場資訊和公關網絡，對台灣企業非常重要；即使在兩岸直接通商通航以後，台灣企業也仍需要這些服務，尤其是對珠江三角洲及其他華南地區的貨物轉運，更需繼續借重香港而不會受到直接「三通」的影響。香港對台灣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價值，台灣必須在九七前後，就利用香港問題與大陸方面談判。

綜上所述，香港九七因素可能是促使兩岸政經關係發展的轉捩點。兩岸和平統一雖然遙遙無期，但是政治關係的正常和良性發展，兩岸三地開展進一步經濟合作十分重要。有論者以為中共在九七年前後會部署武力攻台或逼使台灣與大陸統一，筆者認為這是對兩岸關係的內在動力缺少正確了解而得出的錯誤推論。兩岸淡化統獨爭議，以理性談判改善政治關係，大力開展兩岸三地的經濟合作，應該是九七年後兩岸三地關係的大勢所趨。

「禍」、「福」？

繼《香港九七透視》後，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選修「雜誌編輯學」同學們繼續出版了《九七啟示錄》第六期。它乃討論「九七」前後香港可能發生各種重大問題的續篇。

同學們從學習編輯雜誌的過程中，逐步研究題材，消化資料。運用演繹、歸納、比較推理寫作方法，針對每一個題目，訪問每一位對像人物。文字深入淺出，內容廣徵博引，儘量站在客觀立場，找出答案，滿足讀者的求知慾。我們希望能做到「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不願「一葉蔽目，不見泰山」；更不願「兩豆塞耳，不聞雷霆」。

最近參加香港外國人普通話比賽冠軍澳洲青年 Adrian Harrison 夏里臣，以「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個饒具寓意的故事來勸勉有「九七」疑惑的香港人。夏氏認為「九七」對香港人是「福」多於是「禍」。理由是香港始終是中國人的地方，應該由中國人來管治。雖然大家擔心「九七」後香港人權及新聞自由狀況等問題，但是中國人的地方由英國人管治始終不像話。所謂「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禍、福之說，也就不攻自破。

夏氏自認對中國、香港認識不深，但竟有此喻。那麼，身為香港人對「九七」的「禍」、「福」應該抱著甚麼態度呢？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這句話現在用來啟發人們要辯証地看「九七」問題；在一定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能引出壞的結果。本期雜誌內容有「福」亦有「禍」，報「喜」也報「憂」。災禍啊跟著的可能是幸福；幸福啊也可能隱存著災禍。請大家用樸素的辯証來解答香港「九七」前後可能發生的問題，雖不中亦不遠矣。

中國與港英之間的爭拗，表面看來是禍，但內裡所存的乾坤，也可能是福。

陳立光

誰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長官

我願君主心，化作火明燭，

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王慧慈　謝佩怡　黃凱蒂

尚有九百餘日，香港便正式回歸中國。面臨九七，許多港人開始談論和推測誰會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任行政長官；到底行政長官來自那一個階層：公務員？政黨領袖？學者？工商界人士？

其實，＜基本法＞第四十四、四十七條早已替特區的行政長官訂下條件：特區行政長官須最少年滿四十歲，居住香港連續滿廿年的香港永久居民，而且在外國無居留權。除了上述的主觀條件外，還有那些客觀因素會影響出任特區首長呢？就這問題，本刊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

問卷調查結果

有關是次未來特區行政首長需具備條件的問卷調查，共發出了二百份，成功收回一百七十九份，收回率達百分之八十九點五。訪問對象是不同年齡及不同階層的香港居民。

問卷內容主要是探討港人對特區行政首長的要求，從中找出他們理想的人選。從問卷的一條自由問題（open question），問及心目中的理想人選，陳方安生及楊鐵樑是普遍被訪者心目中的未來特區行政首長，對於兩人的資料，稍後會作較詳細的介紹；以下抽出其中幾項較具爭議性的條件加以比較。

在成功收回的問卷中，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被訪者認爲，行政首長獲港人支持比獲中方支持更重要；相反認爲獲得中方支持比港人支持重要的有百分之二十四。

在選擇行政長官的理想年齡方面，分爲五個級別，最多人選擇的是四十六至五十歲，而選擇五十六歲以上的，只佔百分之三，這反映大部份被訪者傾向於選擇一些較成熟、具有豐富人生經驗，及仍有良好工作能力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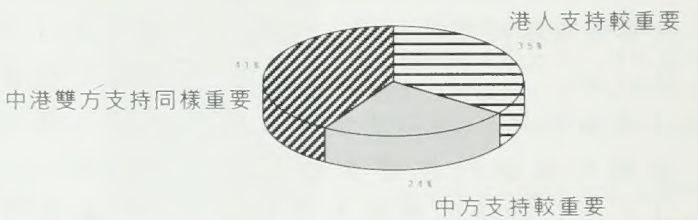
對於行政首長的性別，大部份被訪者均認爲沒有意見，但選擇男性的比女性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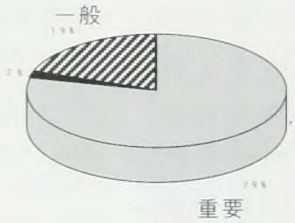
客觀條件要求上，認爲特區行政長官需要曾任職政府官員的佔百分之四十，而有百分之二十三則表示是否公務員並不重要。

據圖表顯示，有近八成被訪者認爲，曾有參政經驗對行政首長來說是重要，只有不足一成認爲參政經驗並不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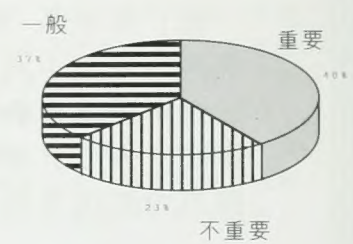
此外，有半數的被訪者認爲未來特區行政首長必須有份參與基本法起草工作，而認爲具此條件的重要性只是一般及不重要的分別佔三成及二成。

行政長官受支持程度





曾有參政經驗



曾任政府官員

各大政黨意見不同

民主黨張炳良認為，作為未來特區行政首長，他必須具備一定的客觀條件，例如具有較高的工作能力及民望，尤其要被港人和公務員廣泛接受，最理想的是通過全面直選產生。但現實並不可能做到。

除了一般的客觀條件外，他認為政治技巧亦是不可缺少的。他解釋，據基本法規定，特區行政首長必須由選舉委員會產生，但委員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卻沒有說明，因此有很大的機會由中方「欽點」。

特區行政首長面對擁有直選議席，及廣受性比他高的立法局議員，他除了要令立法局不要失控，亦要確定立法局的高度自治，使行政立法互相配合。

張炳良續稱，特區行政首長除了處理本港的內務，還必須與中方有良好的關係，以協調中港不同的看法，並向中方爭取港人利益，維護本港自主權。

他強調，誰人任行政首長並不重要，縱使他本身條件不如理想，但若有一個健全的制度，有足夠的權力去監察和制衡，兩者必能互補不足，相輔相承。

民協梁廣昌則認為，特區行政首長最重要是擁有公信力，最理想是透過選舉委員會，由一人一票方式選出，但經此辦法選出的人，卻又未必能獲中方支持；但若由中方委任行政長官，則香港市民未必接受。

面對這微妙的關係，他認為行政首長必須有足夠的政治協調能力：一方面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另外又有能力為香港爭取權益，並且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民建聯秘書長程介南則認為，除了基本法所訂的必要資格外，最重要的條件有三點：

一． 得到普遍港人支持和接受，以穩定社會；

二． 認識香港社會運作；

三． 與公務員有聯繫：因為公務員在港府的架構中佔很大比重。

程介南相信，隨著九七的臨近，港人開始意識到應該要有人站出來。

他又估計，以公務員出任特區首長的機會較大，原因是公務員對香港事務有較深的認識，而其工作範圍涉及政府機制與運作。相反，政治人物卻不大適合，因為政治人物擁有明顯的政治立場，而且社會上始終存在著不同意見，不能令所有人都認同他的主張，因此會影響中立性，所以政黨人物出任行政首長的機會不大。

社會人士的看法

城市大學社會及公共行政學系講師梁燕紅認為，香港後過渡期的政局變化很大，而且很多政治、社會因素還未明朗，所以誰是首屆行政長官，亦是未知數。

不過無論是由誰擔任此職，都必須得到中國政府接受，及港人接受，雖然不一定是政治人物，但必定是對政治有認識，可能是公務員。

中方委任的行政首長，應該是與中方不對抗，同時港人又不反對的。中方為了本港初期的平穩過渡，可能會委任一名港府官員，穩定公務員體制。他雖然不是中方安心的人選，但至少不是令中方反感的司級官員，以能起一至兩年穩定香港的作用。

專欄作家黃毓民表示，本港的政治架構一直採用行政主導的模式，九七年後也會一樣，所以行政首長必然是一個有足夠政治技巧的官僚，熟悉選舉議會的運作，懂得與立法局、公眾和傳媒溝通，而其政治立場必須中立。

為了維持一個制度銜接、公務員體制延續及公共事務得以繼續執行的政府，所以他支持由陳方安生接任首屆行政首長，以減少社會對政府的對抗。

但是無論行政長官是誰，最重要是對港人「守法負責」。

時事評論員岑逸飛則強調，行政首長應該以香港為本位，而不是中國，所謂「愛港愛國」，便是以港人利益為立場。這並不是鼓吹獨立，但要利用技巧與中國交涉，不會犧牲港人利益。

港事顧問譚耀宗認為，首任香港特區行政首長必須為港人接受；他本身要有一定的才幹，熟悉香港各種事務的運作，才能有管治香港的能力。行政長官的道德操守亦非常重要，行為處事必須公正。

對於〈基本法〉規定將來的特區行政首長不能擁有外國護照（居留權），譚耀宗認為此條件是合理的，因為假若他已有外國的居留權，代表他已根本無意於九七後留港，造福港人。

許多港人憂慮，中國政府會派員來港擔任首屆行政長官，但譚耀宗則指出，早在〈基本法〉內已清楚列明特區首長必須由當地選舉或協商產生，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假若中方派員擔任特區首長便是違反〈基本法〉。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圖案

現任布政司、首席大法官
皆為行政長官熱門人選

陳方安生
現任布政司　五十四歲

陳方安生於一九四零年在上海出生，原籍安徽，少年時曾在天津居住，直至八歲才舉家到香港定居。

方家共有八兄弟姐妹，陳方安生排行第二，父親早在五一年逝世，生活由母親和叔父方心讓、方心照分擔。而陳太的夫婿是加德士石油公司行政董事。

陳方安生於一九六二年在香港大學英國文學系畢業，她原想進修社會工作，但碰上政府招聘政務主任，九月便加入港府。

她曾先後在漁農處、財政科工商處、前新界民政署、前社會福利科擔任要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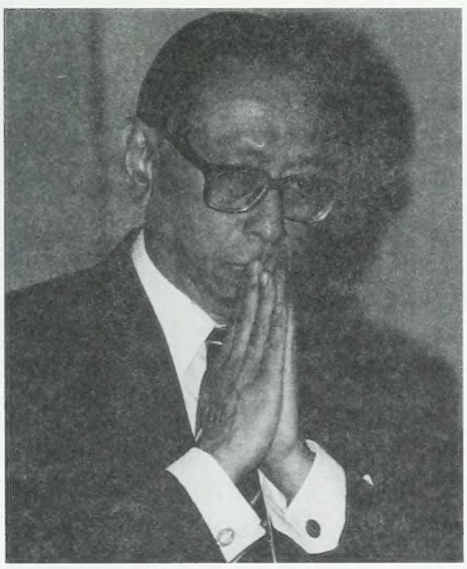
七九至八七年間，陳方安生分別出任社會福利署副署長和署長要職。這時她碰上了轟動的「郭阿女事件」，並下令破門入屋，救出獨自留在家中的小女孩郭阿女，及引用〈保障婦孺條例〉將母女兩人分隔，一時受盡社會人士批評，但陳方安生仍堅持自己的決定。

八七年陳方安生擢升為經濟司，進身為司級官員，隨即又面對群情反對興建大亞灣核電站。

去年四月接任公務員事務司後，又碰上公務員要求追補加薪，以及引起近來本地公務員不滿的外籍公務員轉制問題。

一連串棘手問題，不但沒有影響陳方安生的仕途，而且憑著果斷、強硬的辦事作風，於去年六月出任署理布司後，十一月陳太終於成為首任華人布政司，更被稱為「香港鐵娘子」。

現任布政司陳方安生。



現任首席大法官楊鐵樑。

楊鐵樑爵士
首席大法官
六十五歲

楊鐵樑爵士於一九二九年六月三十日在上海出生，四六至四九年間就讀上海東吳大學法律學院，後來在香港大學及倫敦大學繼續攻讀。五三年獲榮譽法學士銜，五四年考取大律師資格。

楊鐵樑的公職服務始於五六年出任裁判司，六三年晉升為高級裁判司，六八年陞為地方法院法官，七五年他進身最高法院原訟庭按察司，八零年獲委任為上訴庭按察司，至八七年出任上訴庭副庭長。

於八八年獲委任為首席大法官的楊鐵樑，是本港首位華人擔任此要職。投身司法部門達三十八年的楊爵士，在擔任首席大法官時，為其五年任期訂下四項目標：設立終審庭、推行中、英雙語法庭制度、吸引更多本地律師投身法官行列，及提升司法制度的良好聲譽。

九三年，他獲港督延長任期至一九九六年，以協助本港司法制度的過渡。

“九七”主權回歸中國！駐軍香港隱憂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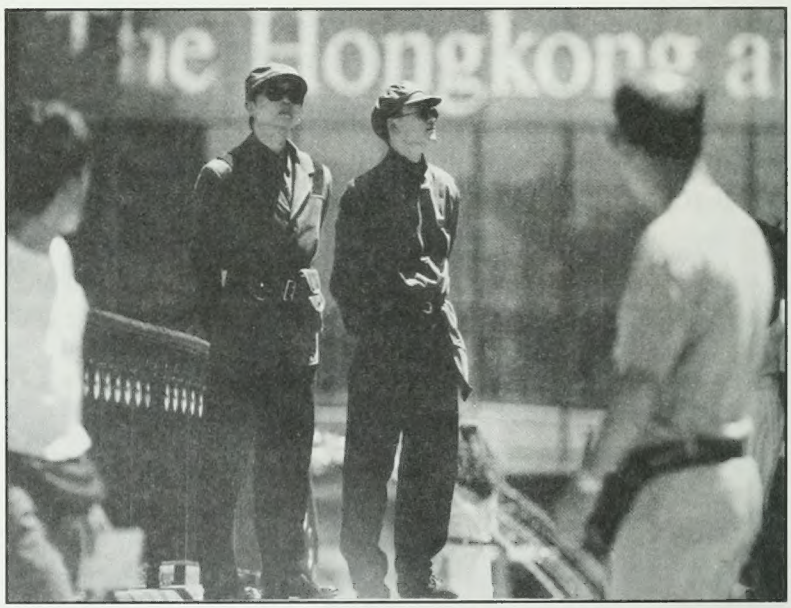
『名正、言順、事成，則禮樂興。』

黃頌文

踏入一九九五年，香港距回歸之期只剩下兩年多時間，不足一百天。

九七年七月一日，解放軍進駐香港特別行政區已成不爭之事實。根據基本法第十四條，「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治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防務」，駐軍固然乃體現中國主權統一的一種表徵，但解放軍將以何種形式進駐？其質量、數目又如何？權力範圍多大？會否干涉特區具體事務？會否從商？會否對港人構成威脅？會否成為中國第八軍區？大學生是否需要接受軍訓？等問題均為未知之數。廣大市民對駐港解放軍所扮演之角色諱莫如深，擔心這批維護政權的槍桿子英雄會否享有廣泛的優待與特權，而飛揚跋扈、作威作福，令居民望而生畏！

駐軍香港事在必行
準備工作如火如荼



軍民關係不可能照搬內地的一套，正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鄧小平一直強調九七年後解放軍駐港的重要，他認為駐軍有兩個目的：一是對中國主權統一的體現；二是對企圖擾亂的人起威懾的作用，若非發生大動亂，中國是不會出動駐軍的。

據悉，自從香港特區預委會成立後，現年62歲的解放軍常務副總參謀長徐惠滋中將，已獲派出任香港特區籌委預委會成員，並開始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這支部隊的各級領導幹部已從各大軍區選拔出來，於九三年七月調派到深圳集訓。

據了解，這支部隊大概是一個加強旅的編制，包括三個軍種。陸軍主要是來自廣州，空軍來自南寧，海軍來自汕頭。部隊的司令員來自北京，其級別相當於大軍區副司令員。據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研究學系講師丁偉博士估計，駐港總人數會較一個師（一萬人）為少，

目前在深圳集訓的，都是部隊的幹部。現階段他們主要學習中共中央對港的方針政策，包括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以及熟悉駐港的基本任務、香港特區性質、環境、語言生活習慣及解放軍風紀教育等。據說在集訓期間，軍委還將安排這批軍官以各種掩護身份來港實地考察，軍事訓練會安排在深圳以北五十多公里的樟木頭兵站進行。

鑑於香港是國際大商港，三面環海，海軍將佔很大比例，軍艦駐港主要是海港防禦，保證航運安全，與及配合水警防止走私，海盜等活動，陸軍預計一千人左右，和少量的航空兵駐守機場。

為了解決駐港部隊的後勤補給問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亦在深圳皇崗口岸附近劃了一塊地準備興建後勤中心，並安排部隊家眷入住，但駐港部隊將不攜眷入港。

目前全中國劃分為七大軍區，即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成都軍區、蘭州軍區、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和廣州軍區。各大軍區均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據丁偉估計，香港特別行政區將隸屬於廣州軍區，而駐港總司令則可能是現年64歲之廣州軍區司令員李希林。

解放軍駐港三大憂慮：

一九九四年九月北京發生解放軍連級軍官，因私人恩怨引發的亂槍掃射之駭人慘劇，不但打死了該名軍官所在的部隊團政委及射傷幾十名同僚，更在北京市使館區亂槍掃射途人，導致十死四十多人受傷。雖然事件真相至今未明，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無論如何，在中國經濟開放改革浪潮下，軍隊質素正面對著莫大的衝擊。

憂慮一：軍隊從商，弄權自肥？

隨著商品經濟和市場的深化，大[illegible]民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軍隊的生活水平則未見改善。據《當代月刊》（1994年10月15日）[illegible]的一項調查顯示，一九九四年，軍隊基層士兵的平均工資比地方的同齡職工高百分之四十左右，但到了一九八七年，軍隊基層士兵的[illegible]已比全國職工的平均工資低百分之零點二四。近年來，隨著[illegible]老百姓的實際收入上升，而軍隊的實際生活反過來沒有多大的改善，再加上百物騰貴，及有些部隊裡的軍官藉公營私，弄權自肥，更令上下級的關係矛盾重重，形成低下層軍人牢騷滿腹。

據調查所得，近年來不少士兵根本要「帶錢入伍」，或者每月還要家人送錢到部隊裡供他使

"九七"後是否能做到「實存乎慎法，使喪今者戒」？

南華早報借照

用。某師曾對一百二十八人進行調查，發覺每年工資略有盈餘的只有十六人，即百分之十二點五；收支平衡的有六十八人，即百分之五十三點一；不夠開支而要借錢的有四十四人，即百分之三十四點四。他們生活之苦況可見一斑。

鑑於香港的生活指數與大陸差距甚大，浸會大學講師丁偉認為「即使駐港軍人在港的收入比現時大陸軍人還高，他們仍難以應付香港之高生活水平」，駐港軍人為了補助軍費開支及提高軍人生活水平、改革軍備及促使軍備現代化，九七後軍隊從商之現象必定會出現。

丁偉指出，軍隊從商對軍隊整體之影響相當大，由於軍隊理論上全副精神應集中在保家衛國，閒時應勤於訓練和提高戰鬥水準，故不應將時間精力花在從商方面。但這是中國的特殊情況，如清華大學、全國人大、中央黨校在國內均有多達數以百計的公司，而位於深圳的長城工業集團，擁有十九家企業，便屬廣州軍區第四十二軍所控制。

他認為，軍隊積極從商賺錢，將導致其內部出現貪污情況，促成他們的飛揚跋扈。加上他們的政治背景，容易處於壟斷地位，對於香港自由競爭之經濟體系絕無好處。

憂慮二：法治問題

基本法第十四條明言「駐軍人員除須遵守全國性的法律外，還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但是，中國的法律系統與香港的普通法系統並行於駐港解放軍身上，很可能會產生很大程度上的矛盾。例如，香港刑法中的遊蕩罪、墮胎罪，在中國刑法並不存在，而中國刑法中的挪用

九七後，大專學生是否需要接受軍訓？

特定款物罪，投機倒把罪等亦不存在於香港刑法，因此，駐港解放軍在香港犯了法後，他們應受中國法律、黨紀、軍紀，還是受香港法律制裁？這種法律上的難題，尚有待進一步研究。

另一方面，駐港解放軍值勤時間的紀律當然是由其軍官負責，但下班後，在軍營外自由活動時，他們會否如英軍般受香港警方管轄？還是受軍警管轄？若受香港警方管轄，當執行任務時，警權是否足以制衡他們的行為？若受軍警管轄？他們之間又會否朋比為奸，官官相衛？不少市民更擔心到若駐港軍人飛揚跋扈，有恃無恐，不受香港法律制肘時，每遇內部不和或利益衝突，「街上亂槍掃射」一幕便會在香港鬧市上演。

憂慮三：香港大專學生要服兵役？？

根據1984年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的《兵役法》，高等院校的學生在就學期間，必須接受基本的軍事訓練。1985年，全國開始在五十二所高等學校進行學生軍訓試點。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體育師範學院的學生最先接受軍訓。

據《廣角鏡》92年7月刊報導，學生軍訓主要分集中訓練和分散訓練兩種。集中訓練主要學習列隊、軍兵種知識、學習兵役法及一些武器的性能，使用方法和防護，以及野營拉練等；分散訓練則主要瞭解外國戰爭歷史和現代戰爭特點，瞭解當代先進科學軍事武器，研究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現代軍事思想等。

按規定，一般高校軍訓時間為八周，全國只有北京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被國家教委指定在河北石家莊陸軍學院等軍事院校軍訓一年。從1989年「六四」開始，這兩所高校的新生要經過一年的軍訓，考試合格後方可開始繼續攻讀四年的本科專業。據丁偉分析，主要原因是他們的思想最自由及最開放，故中共用服兵役的方式迫使他們絕對服從。

然而，香港人一向享有高度之言論及思想自由，特別是知識分子。九七後，中共會否以同樣手段箝制大學生的思想？

丁偉指出，由於香港過去是殖民地，將來是特別行政區，長久以來均沒有服兵役之傳統，無論是長期或短期，華籍英兵根本無人願當。服兵役固然可以作為培養民族意識，愛國愛民，為國犧牲的一種手段，但香港從來沒有這種東西存在，更遑論民族主義。故"九七"後強令大學生服役只會引起反效果。他認為，若中國想香港長治之安，解放軍與港人應多作溝通，多了解港人的文化、思想、感受及實際情況，不胡作菲為，軍紀嚴明。這要比強迫大學生服兵役來得更理性。

然而，"九七"後之政局仍陰霾不明，中共將如何接管香港，解放軍將如何為港人「服務」，尚有待時間去見證一切。

閣下對香港政黨的財政來源知多少？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陳鳳麗

去年「九一八」區議會直選後，催生了許多新的政黨／政治團體。相信政黨活動，尤其是甚爲敏感的財政來源問題。究竟現時各大政黨／政治團體的財政收入又如何？本文將爲你揭示它的來龍去脈。

政治發展的體制下，港府官員多次重申並無計劃制訂政黨法例，用以監管爲迎接今年立法局選舉，這個趨勢定日益劇烈。在香港不斷朝向

選擇了六個政黨／政治團體作訪[illegible]香港協進聯盟。根據公司註冊處及各政黨代表提供的資料，本港政黨的收入來源主要依靠三方面：捐獻、徵收會員會費及議員[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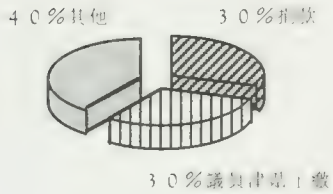
透視各黨財政狀況

「民主黨」[illegible]，其中約有一百萬元來自捐款（約佔總收入三成，見圖一）、三百萬元由議員薪金上繳，餘下的來自會費及借貸。[illegible]「民主黨」現時的財政狀況「非常差」，而且出現「[illegible]缺」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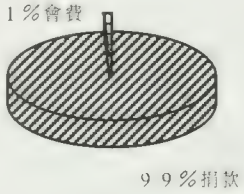
相對「民主黨」，香港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在上年度一共有接近[illegible]入，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的收入來自捐款。「民建聯」[illegible]，於[illegible]團體在籌募經費時得到捐款者認同，方便籌款，因此籌款成績尚佳。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多全部經費收入都是來自募捐（[illegible]）。[illegible]情況相類似。不過，對於上年度[illegible]

圖一：香港各政黨／政治團體93－94年度收入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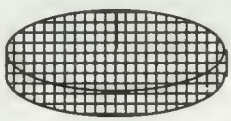
民主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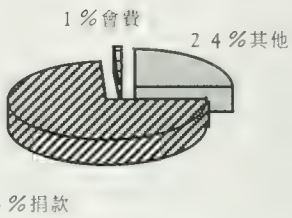
香港民主建港聯盟

自由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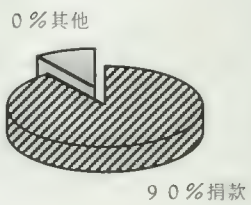
而不用向外募捐的政治團體只有香港協進聯盟，該會主席劉漢銓表示內部會費已足夠該團體一般開支（見圖一），故暫時未考慮向外募捐。



香港協進聯盟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



123民主聯盟

註： 總收入

籌募技巧各有千秋

其實各個政黨的籌募對象及手法的不同，直接影響各黨派的捐款收益。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主席馮檢基表示，該會的主要捐款對象是「朋友、有錢人」。另外，「民協」亦會向外發信、及在街頭募捐。這些募捐的方法為「民協」上年籌得接近一百九十萬元的經費，約佔該會總收入的七成半（見圖一）。

民建聯採用量入為出的做法。

上年度募捐收入佔總收入比例最多的黨派之一的「民建聯」，主席曾鈺成認為該團體的主要募捐對象是工商界及基層人士。曾氏解釋，基層人士範圍廣，該會即使以徵收低廉的會費（全年一百元），仍可透過向基層人士售賣獎券，籌募足夠的經費。去年在獎券籌募方面，「民建聯」共籌得約二百二十七萬多元。

「民主黨」馮偉光認為該黨的募捐對象是中等階層及中下階層市民，故該黨只集中在街頭募捐。以上年度七月為例，只能在街頭籌得二百五十萬元，而全年籌得的款項剛好應付該黨的日常開支。

「自由黨」李鵬飛表示，該黨的籌募對象以商家及專業人士為主，全部都以私人接觸方式上門募捐，沒有街頭籌款。不過，李氏謂：「（自由黨）財政有一定困難，募捐不是容易事。」

去年三月成立的「一二三民主聯

盟」上年度亦有九成經費來自捐款。對於籌得的經費是否足以應付開支，[illegible]「總體勉強足夠」。任氏補充，[illegible]會，籌得幾十萬元經費。去年九[illegible]

[illegible]上繳或內部捐款亦可以爲一些政[illegible]。「匯點」[illegible]檢基透露，該會一般議員需要將[illegible]員更將部份處長職津會管理[illegible]津貼全數上繳。上年度「民協」[illegible]內籌募。

而剛由港同盟、匯點合併的「民主黨」[illegible]的收入源自議員津貼上繳。

籌募經費困難重重

相對於一些新興的政黨，籌募經費時自然遜於根基深厚的政黨。「民建聯」主席曾鈺成認爲該黨在籌募經費時尚未遭遇困難而影響發展工作，可能與該黨「量入爲出」的政策有關。曾氏表示，該黨就財政狀況而決定來年工作，而非在工作計劃後才開始籌募經費。

對於有八年政治經驗的「民協」來說，馮檢基認爲募捐時遭遇的最大困難就是不能預計可以籌得多少捐款。

[illegible]「自由黨」黨魁李鵬飛亦認爲，籌募時最大的困難是不知捐款者是否樂於捐助。一旦籌不到足夠的款項，他們會選擇再努力籌款。若結果仍不如理想，他們則減少開[illegible]的一般運作。

而「民主黨」馮偉光就認爲由於該黨採用街頭募捐方式，市民以個人爲單位捐款，最多只能捐出數萬元，因此籌募款項受到很大的限制。

財政來源透明度低

[illegible]得的知道[illegible]支相當重要，欠缺金錢必定影響運作。[illegible]士向[illegible]政黨在社會事務上的[illegible]？對於捐款者的資料是否可以公開？市民或捐款者又如何監察各個政黨的運作呢？

「民協」匯檢基表示，[illegible]政黨不論[illegible]捐款者的資料主要是基於[illegible]因素：（一）政黨不希望公開由某一些機構[illegible]，例如：地產商，以免影響其[illegible]；（二）[illegible]些捐款人不希望公開自己的身份，以免因某些政黨的政治取[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一般具知名度的捐款者不願介入政[illegible]，[illegible]他對不同政黨的捐款數字，以免引起尷尬。

「[illegible]」[illegible]有監察力量，沒有執政功能，因此對社會決策的影響力少。相信[illegible]，藉此影響政黨在社會上的[illegible]。

此外，雷競旋表示現今政黨財政來源透明度低，並期望[illegible]，相信[illegible]，不過[illegible]而已。

馮檢基認爲最困難的是不知可籌到多少捐款。

中港兩地犯罪問題日益嚴重 —

面臨九七，香港警隊如何面對新挑戰？

陳婉儀

「皇家」警察不會沿用

近年來，香港警察的質素、人數、裝備、設施等均已發生很大變化。一九七零年，更獲英女皇欽賜，冠以『皇家』銜頭，改名皇家香港警察。但隨著九七年主權主體的更迭，香港警察再不能冠以『皇家』這個名稱。

中英聯合聲明條文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有關部份列載：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維持。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國防事務的部隊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內部事務。（附件一第十二節）

此外，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原在香港各駐防軍隊（包括警察部隊）……其人員特權待遇的規定外，均予以保留。（附件一第四節）（保安，治安，廉政公署及各種投訴途徑最後報告《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聯絡行委員會通過》）

治安仍由警察維持

因此，香港人毋須擔心於「九七」年後，中國的公安部會南下直接行警務工作，因為他們已承遵守在聯合聲明中訂定的條文即是「九七」後，香港的治安仍由香港警隊維持，包括執行傳統警務工作，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以及防止與偵查罪案等。

當然在非常時期，警察和軍隊頗為相似，如陸軍會協助警隊維持境內秩序，而空軍則為警隊提供直接支援，至於海軍會協助警方偵緝毒品及私貨。

另外，若「九七」年後，香港警務處中國公安部，與駐守本港的中國軍隊合作，亦屬正常。

加入警隊工作是很多人的理想。（圖片來源：皇家香港警察九一年報）

兩地如何對付罪行

拘捕非法入境者仍由警隊執行。（圖片來源：皇家香港警察九一年報）

打擊走私及詐騙案

警隊對未來的信心

警察的工作量將會增加。（圖片來源：皇家香港警察九一年報）

中國對一國兩制的新說法

「政治要聽命北京，經濟則可以自主。」

曾志康

「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掌管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中英聯合聲明第三條第二款。

聯合聲明中所謂的高度自治，中文大學政治系翁松燃教授認為一國兩制現時分為政治及經濟兩方面，中國共產黨極權政制根本不能容許有第二勢力存在（即資本主義），而在經濟方面，可能會有自由發展的餘地。

九七年英國旗除下，象徵一國兩制正式實行。

政治

所謂自治並非隨心所欲

翁松燃教授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自治根本沒有可能個接近全權或者極權主義的獨裁政制根本無法容納同自己意識形態不同的勢力存在。中共建國四十幾年來，他們一直緊握權力中心，從不放鬆，又不給他們助長的機會，香港似乎亦不例外。

他說：「一國兩制當初是一種統戰手段，如果你認為一國兩制可以任由港人想怎麼做就怎麼做，那你的想法就完全錯誤。」

翁氏表示，中共對主權的體現似乎比香港人認為好的制度更重要。為了體現主權，一國兩制也好，高度自治及港人治港也好，都可以隨時調整，總之與主權回歸原則不能牴觸。

行政主導難以體現自治

香港特別行區的政治體制仍然會是行政主導的政體，行政首長有很大權力，例如行政長官有權

解散國會。立法工作方面，動議權集中由行政首長領導下的行政機關，而立法委員提出的私人動議不得涉及公共開支、政治架構和政府的運作。

翁氏認為，在這行政主導的政體中，只要控制一個行政長官，而立法會的權力亦有限，根本無法對行政長官產生有效的制衡。若行政長官聽命北京，那麼高度自治便會蕩然無存。這十年來的事，他認為中共希望按照以往英國統治香港的辦法，委任統治香港，政治方面要聽從中央指揮，經濟方面大可放寬限制，現時的時局變遷，大方向中方早已預計得到。

不過，當中亦可能出現變數，例如蘇聯解體，東歐共產陣營崩潰，甚至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都是加速這個變化

中共亦於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共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間接說明香港是一個顛覆基地

一國兩制 原是統戰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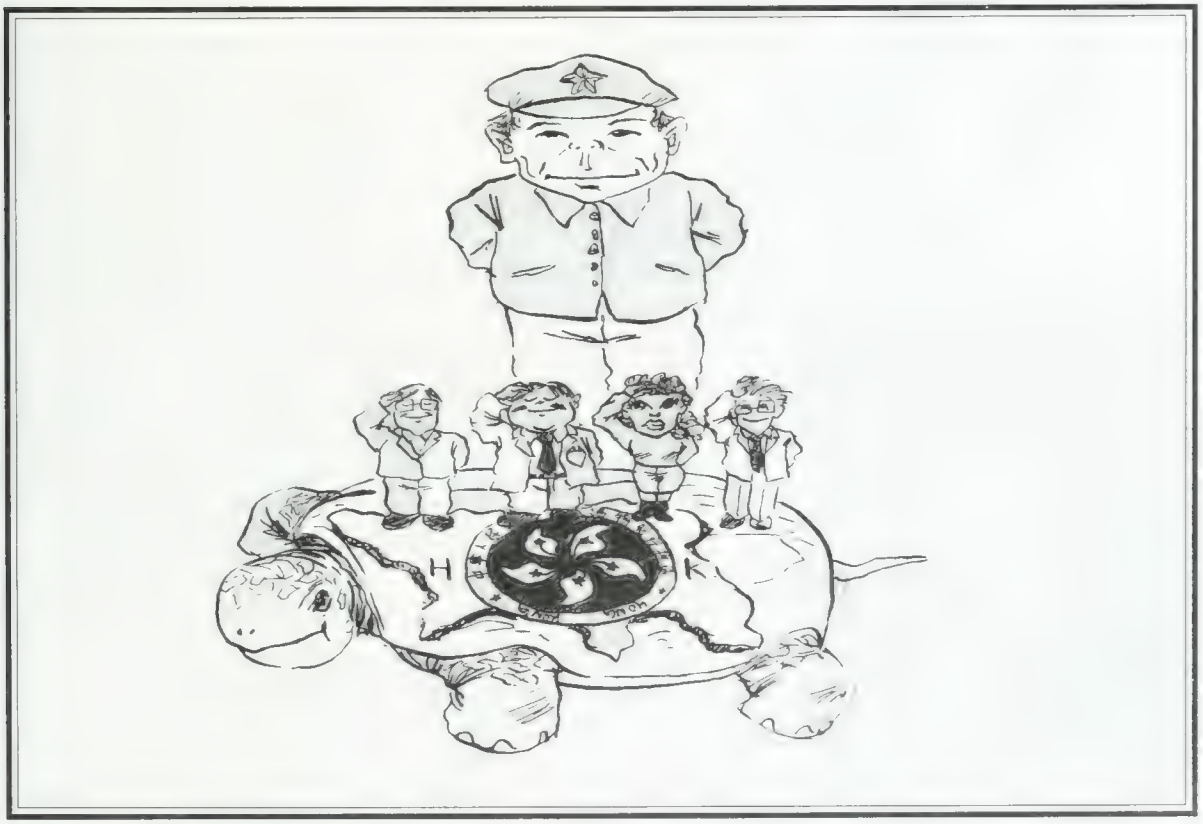
一國兩制是一個既要體現主權，又要高度自治的制度，翁氏表示原先這只是統戰手段，說香港人喜歡聽的說話。事後的現實情況絕不一樣，北京政權已掌握香港的情況瞭如指掌，香港的發展要依照北京政權的意見發展，而經濟方面就保留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

經濟

國內漸成本港經濟依歸

雖然政治方面完全沒有真正高度自治的基礎，不過一國兩制在經濟方面就有發展機會。大陸慢慢接受香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亦逐漸走向資本主義化，最重要本質是

香港的經濟發展愈來愈依靠中國大陸，翁松燃教授表示以前有看「香港是中國大陸手中發展的火車頭」。不過現在剛巧相反，香港本身沒有前途，所謂的前途就要依靠大陸的支持。香港的製造工業早已北移大陸，而外匯、投資等，中方資本在香港亦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香港作為大陸的踏腳石，不容置疑



特區政府領導班子易受北京操縱。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

九七以後 香港人權問題又如何？

陳文超

還有不足千日時間，香港主權便要回歸中國，而距離主權移交之日愈近，港人對未來人權狀況便愈擔心。因為香港與中國經過百多年的分隔，兩地在政治、經濟及社會三方面的發展，皆大大不同。

本港發展背後的基礎為西方的資本主義，而中國所堅持的則是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兩者的不同令港人擔心現有的制度可能在「九七」年以後被廢除。不過，相信港人最擔心會失去的，非「人權」莫屬了。

劉慧卿議員認為香港現在的人權狀況還須改進。

人權為何物：

為什麼「人權」對港人是那樣重要呢？先看「人權」的字面意義，那就是做人的權利，而最基本的人權，就是說話的權利，吃的權利，較次的人權，才是言論自由權利，政治選舉權利等。可見人權與我們的生活關係密切，人權對我們的重要，尤如三餐一宿。

香港與中國人權現狀的分別：

由於各地的政治制度不同，所抱的主導思想又不同，因而不同社會及不同國家對人權的體會，亦有差別。

西方國家對人權的包涵頗廣，人民除了可享有最基本的權利外，亦可擁有罷工、示威、自由言論等不同的權利，因為西方所深信的是個人主義，甚麼也以個人為本，而國家只是為人民而存在的產物。

受著西方國家一一英國百餘年管治的香港，在人權體會上，較接近西方，所以市民所享有的權利亦較中國人民為多。

至於中國作為本港未來的主權國，不知是否歷史沿襲的關係，個人利益遠不及國家利益重要，這可能是中國人傳統的「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所致。

因此，中國的人權相較於西方社會，相較於香港，所包含的意義便較窄，因為人民要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才可擁有個人權利。所以，中國政府可以為了令全國各地得到均衡發展，而迫令市民遷往被編排的地方居住，工作於被分配的行業，老百姓變為是鞏固國家的基礎工具。

本港人權現狀：

觀乎中、港兩地的人權現狀，本港的發展程度遠較中國為快，但本港的人權現狀，又是否令人滿意呢？

立法局議員劉慧卿認為，本港人權狀況與其它亞洲國家比較，實已不差，但她仍覺得，本港人權現狀，還有很多不足之處。

她指出，港府雖於九一年通過了人權法案，但其約束範圍卻只局限於政府部門，對私人機構根本無效，私營機構東主仍會以

性別、年齡、樣貌等條件，來選聘一些根本不須受上述條件限制的員工。

法例方面，她指出，像護視法庭一例，立法局議員們已多次要求有關方面，品質和服務內容，但得到的結果，只是律政司作出一些指引，並未指明此例內容。

嶺南學院通識教育部講師史文鴻亦認為，本港人權現狀欠理想。他表示，九一年所通過的人權法案，表面上好像已把本港人權發展推前一步，但實際上，此法仍有不少漏洞，例如在男女平等和不同階層的基本權利保障等事上，人權法就沒有提及。執法方面，此法又未有指定執法機構，當發生違反人權法的事時，亦不知由誰來處理。

他又指出，本港現有的人權聯會等組織，只是一些純監察機構，對保障人權並不起甚麼大作用。

史文鴻博士擔心人權法和基本法抵觸。

議員及學者眼中的本港人權前景：

雖說本港人權現狀還有很多不足之處，但總較本港未來的宗主國為佳，所以，很多香港人十分擔心「九七」後的人權狀況，會停滯不前，或比現在更差。

劉慧卿議員相信，九七年後，本港思想、學術等方面，皆會受到一定影響。

她指出，中方可能會引入國家保安法，使港人受到更多制肘，那時港人可能連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也沒有。

史文鴻認為，「九七」年以後的本港人權狀況，可能會出現倒退現象。他預測，那時本港可能會恢復死刑，叛國法、反革命法等法例亦可能會被引入，使港人受到更多限制。史氏又擔心基本法與現行的本港人權法可能在銜接上產生問題，令人權法變得毫無作用。

從樂觀角度看本港人權前景：

雖然劉慧卿及史文鴻對本港人權前景都不甚樂觀，但實際情況其實不如他們所說的那麼糟。

本港現時的主權國英國於七十年代，已簽訂了兩條國際公約，分別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因而本港亦同時受到這兩條公約的保護。不過，中國卻未有簽訂任何人權公約，故本港一旦回歸中國後，便會自動失去這兩條公約的保護。

根據基本法三十九條規定寫明，特區政府自行立法時，會將這兩條公約適用香港部份予以實施，這可能會予港人錯覺，相信這兩條由本港前主權國英國所簽訂的人權公約，還有一定約束力，但基本法中只是將公約的適用本港部分列入，「適用」其實頗為抽象，因為中國可能會認為沒有任何「適用」部份呢。

此外，中國當局早前曾公開表明，不會於「九七」年後，不本港向聯合國提交人權現狀報告，這使港人對未來本港人權前

[illegible]中國最惠國待遇條件，與改善人權狀況掛鉤，因而令很多人會擔心，美國可能為著已經濟利益，已不顧中國人權發展狀況，因[illegible]國會從此失去一張要求中國改善人權的牌。

以上種種情況雖對本港人權前景不[illegible]，實際情況，並不如所見的差。

中國自一九七八年實施開放政策迄今，有效而[illegible]等方面已有一定發展，[illegible]狀況亦較前進步不少。

一九九二年，中國官方就曾首次制訂人權文件，雖然文件內容不盡為西方所認同，但最少已看到中國正在改變中。

至於中國雖聲明不會向聯合國呈交本港人權狀況報告，但它不見得中國有意抹煞本港一切現有的人權。而美國雖失去與中國商談改善人權的憑藉，但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時，卻能幫助中國經濟發展，對中國其它方面的發展實際上亦起了積極作用。正如九二年[illegible]的美國國會議員[illegible]所說，要令人權得以保障，最有效方法是協助中國，繼續自由開放的經濟改革，使本港在政治上的自由，能輸入中國。

另一方面，英國作為本港現任主權國，已將本港人權事務國際化，令更多國家關心本港人權狀況及前景，就如嶺南學院的史文鴻所說，其它國家的關注，對[illegible]年後本港人權[illegible]，會有積極作用，因各國在施壓力的同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能置之不理。

總而言之，本港人權前景雖不明朗，但觀乎各種因素，本港人權前景卻未必會變得更糟。

雙重末世的香港人更貪婪、更猥褻、更兇殘——

香港文化帝國主義入侵全球華人社會

香港浸會大學影視系主任吳昊如是說。

李美莉

毫無疑問，「九七」是香港人的重要時刻——政權的轉移、部份投資者離，仍人心惶惶的巔峰期。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和經濟上。但究竟又有多少人會留意到香港傳媒之一——電視也在無聲地起「革命」。

雙重末世節目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電影及電視錄像系系主任吳昊察覺到電視台都在製作歌舞昇平、天地同春的節目。

他說：「為了迎合「九七」，不久將來的電視劇集或其它新聞節目都可能標榜香港是個美麗的地方。「九七」年後，香港仍是個人間樂土。」

另一方面，他又說「九七」在這個世紀末把香港人推進另一個末世感裏。每逢末世都有怪事出現，而「九七」更給予香港人另個關限。而「九七」前，香港人的情緒正不斷在變化。從而製造了「雙重末世」

他說：「雙重末世的人更貪婪、更猥褻、更兇殘、更憤怒和痛苦。所有尖端的情緒都全部湧現出來。於是，現有的電視節目，如『今日睇真D』、『城市追擊』便是捕捉這類尖端的情緒、光怪陸離的現象，這便是古靈精怪現實的趣味，突而製作了這類的雙重末世節目。」

吳昊催促電視台提供更多資訊節目。

他續道，這類的光怪陸離的現象以往鮮為人知，但現在卻成為大家都想收看的娛樂節目。這兩種情況便是香港邁向「九七」的兩個特殊現象。

「浸大」講師卓伯棠認為傳媒工作者應站在客觀的立場。

電影傾向中國

而另一位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電影及電視錄像系講師卓伯棠則發覺，近年來香港電影和電視已漸漸傾向中國，描述中國大陸的人和事績有增加的趨勢。而且更開始讚揚中國大陸某方面的表現。

就以公安為例，多年前的電影及電視下的公安角色是被諷刺、被嘲笑的，如『表姐，你好野！』一系列的電影等。

但是，現在電影中的公安卻被神化了、被描述成為「英雄」，相反香港警察則被描述為"咖啡啡"角色、匪類。就如『中南海保鏢』。

他說：「這是沒有辦法的。因為「九七」後，香港成為特區政府，要與中國交往、了解中國。要了解中國便自自然然要拍攝中國的人和事」。

他表示，了解中國本身是件好事，越深越多便越好。但是，他強調問題並不只是「了解中國」這麼簡單，而是製作方面有所改變。

就如公安例，他認為電影及電視製作人把事實逐漸歪曲，他們沒有站在標準平實的角度審核內容。

他說：「我覺得這不是作為一個傳媒或一個藝術工作者應有的態度。他們這樣的做法並不能反映現實情況。我認為他們應該站在客觀的立場：有不好的就要批評；有好的當然可以讚揚。」

卓氏更表示，這樣的做法不單止迎合中國當局，更會變成中國的奴僕品——貶低自己而指責別人。而其後果更不可以把香港變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社會。香港的傳媒於「九七」後也會變成「政府的喉舌」。

創作獨特文化

相反，吳氏則不贊同這個想法。他認為九十年代香港已經建立他們獨立文化，這獨特的香港文化不但脫離了中國和英國，而且續漸影響全球華人社會，進入自己製造的「文化帝國主義」。

正如吳氏所說，香港的電影和錄影帶已進入中國、台灣，形成香港電影獨霸一方，全球各地的華人都受香港傳媒作品的影響。

他說：「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文化帝國主義已成為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媒介。只有她透過傳媒的文化、價值觀念和精神面貌影響別人，並沒有別人能影響[illegible]。

娛樂節目泛濫

他表示，現時香港兩間大的電視台——無線翡翠台、和亞洲本港台，始終維持以娛樂節目為大比數。

卓氏認為其原因是近年來的收視率開始走下坡，電視台為了挽救，製作娛樂節目便越來越多，從而吸引觀眾挽救收視率。因此娛樂節目的比重增漸增加，而資訊節目則相對地減少。

他說：「在這種情況下，電視台便控制了觀眾看節目，並不是觀眾有所選擇。」

吳氏說，電視是國民教育，可以改變人民的品味，文化水平。他批評，如果電視只是提供聲色犬馬的節目，香港市民的文化質素便永遠不會提[illegible]。

催促廣播資訊

所以他催促電視台應提供更多資訊，避而提高香港人的文化素養，令香港人慢慢放棄末世麻木不仁的感覺。

他說：「現在傳媒應負起國民教育的責任，急起直追提供多些資訊節目。」

卓氏說，媒介根本有帶動力量，[illegible]以媒介本身應有自己立場，[illegible]客觀，不應隱惡揚善。

吳氏續道，媒介和觀眾[illegible]影響[illegible]觀眾[illegible]求[illegible]觀眾[illegible]好提供更多[illegible]

于品海與「明報」何去何從？

盛年不再來　一日難再晨

楊潔儀

于品海事件可能成為《明報》發展的轉捩點。

近兩年，《明報》接連遭受打擊，先是有記者席揚被捕、屬下《現代日報》虧損嚴重，該報主席于品海被揭發在加拿大有刑事案底；至近期中策集團宣佈收購部份該報股份，更令外界對《明報》的前途紛表關注，不同程度的揣測此起彼落。

中方希望染指明報？

于品海向有「神秘人」之稱，但《經濟日報》卻能平地聲雷，於九四年十月十日一份特稿中，揭發于氏十五年前在加拿大留學期間，曾因犯盜竊、冒簽支票、非法使用他人信用咭共七項罪名，而被判在當地入獄四個月。消息曝光後，外界除大表震驚外，亦紛紛譴責其欺騙行為，結果于品海要自動辭去報業公會及《明報》等上市公司的主席職位。

于品海主席地位不保，無疑是給予其他人染指該報的機會。雖然于品海曾三番四次強調無意出售《明報》，但因受到各種不利因素所影響，行內人都懷疑他能否支持下去。期間，有人揣測《明報》創辦人查良鏞，可能會東山再起；但另一方面，有人認為以中方財雄勢大，再加上在中方不容許外力染指重要傳媒的今天，《明報》很有可能由中方友好接辦。

對此，查良鏞率先透過傳媒表示，他很滿意現時半退休的生活，故重新執掌《明報》的機會很微；至於中方那一方面，自十月九日《明報》控股公司智才企業宣佈配售十分一該報股份予中策集團後，事情亦開始有點眉目。

黃鴻年是中方代表？

很明顯，這次交易的重要性，不在於股量多少，而是在於集團

明報立場備受考驗？

于品海要拉攏中方？

有人擔心，黃鴻年的入主，會使《明報》的中立立場受動搖

三大英文報紙將何去何從？

「九七」後香港報業前景黯淡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陳潔貞

亞視「六君子」集體辭職，無線拒播毛澤東紀錄片等涉及傳媒自我審查事件，令人擔心香港傳播媒介的取向，會否因憂慮中方壓力而改變立場。

自我審查個案上升

最近「快報」的自我審查，引起了不少行內人士的關注。一篇專欄作家撰寫的文章，由於內容涉及敏感的政治問題，在發行前竟被編輯抽起，這類的事件是否反映出中方對傳媒是有一定的影響力呢？

中英文報紙雙重標準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孔文添（Tim Hamlett）認為，中國政府對中英文報紙，採取「雙重標準」

他指出中方曾經聲明，只要沒有對中國構成任何煽動行為或擾亂社會秩序，香港人可以有絕對自由報導任何新聞

有見及此，孔文添認為只要英文報紙不會在內地發行，中方對其它事會一概不理。他表示，因為香港中文報紙被內地同胞廣泛閱讀的可能性較大，故所受「待遇」也就不同；那即是說，「九七」後中文報紙的內容和發行數量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星期日南華早報」總編輯關玉慈（Ann Quon）認為中國政府在九七年後對英文報紙會採取較寬鬆政策，而對中文報紙則相對嚴厲。她預計有關當局將會密切注意中文報紙的發展情況，進而對其加強審查工作。

關玉慈：南華早報地位穩健，不受其他西報影響。

曹捷：東方快訊在西報中潛力最大，無可能被淘汰。

鄭偉鳴：虎報最近業績好轉，加上有「星系」的支持，前景樂觀。

英文報紙前境黯淡乃自然趨勢

「東方快訊」總編輯曹捷認為「九七」臨近，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所產生的西洋文化，也會續漸衰落，因此讀英文報章的人也就大大減少。

他說：「七十年代，看英文報紙是身份的象徵，但越接近「九七」，這個對英文報章有利的條件也會漸漸消失，英文報紙會越來越不受重視了。」

總編輯曹捷認為英文報章的讀者人數會進一步下降，主要是基於兩個原因。他稱接近「九七」，將會有大批外國人離開香港，大大削減外國讀者的人數。此外，他估計由於香港人越來越關注時局的發展，對資訊的要求也越大；而中文又是大部份港人的母語，因此中文報章會是他們的第一選擇。他又表示香港人的英文水準下跌，亦是令英文報章需求降低的因素之一，所以其黯淡前景，不是全因政治壓力構成的。

九七帶來的轉變

「九七」帶來的其中一項影響，即市場萎縮，此乃英文報業工作者的最大憂慮。關玉慈稱，在市場收縮之際，「南華早報」的應變策略便是增加財經和中國報導，藉此吸引更多讀者來鞏固其市場地位。

曹氏認為隨著往大陸經商的人日益增加，增加商業報導篇幅乃明智之舉。他又表示，增加中國報導乃理所當然，由於英文報紙比其它外國通訊社具備一個優越條件，就是具有大陸採訪經驗的記者；要保持競爭能力，增加中國報導乃必然趨勢。

「英文虎報」副總編輯鄭偉鳴指出過往的英文報章對中國的報導實在不足夠，而且還有歪曲的情況出現，未能全面反映中方的意見。他認為，「九七」來臨，中方成為主角（Key Player），因此，增加全面的中國報導是該報未來幾年的策略。

除了報導篇幅的改變外，鄭氏擔心「九七」後所帶來的其中一項影響，便是封鎖消息來源。他指出現在報章的消息內容，有百分之七十是香港政府提供的。他說：「但「九七」後，所有消息均由北京政府控制的特區政府發放；若報章的政治路線與中方不符，消息來源可能會受限制。」

孔文添預其「九七」給英文報章帶來的最明顯轉變，便是其地位下降，這是由於普通話的普及性和重要性。但無論如何，英文報章必定會繼續在國際城市扮演一定的角色。

市場能否容納三份英文報紙？

加入英文報業市場不足一年的「東方快訊」，看準了勁敵「南華早報」靠著分類廣告（Classified Post）賺取豐厚利潤，想在廣告市場中分一杯羹；但其表現仍不如理想。在瓜分過「蛋之餘，讀者人數未能大大提高，令不少行內人士質疑狹小的香港市場能否容納三份英文報章。

孔文添認為決定報紙成敗的因素：

（一）報紙有沒有獨特的立場；

（二）財政狀況是否穩健

他認為「虎報」屬親中報紙；「東方快訊」敢於抨擊中方，比較「前衛」；而「南華早報」則[illegible]具其特性。

而財政狀況和廣告利潤亦是致命性的因素。他指出「東方快訊」動用大量資金「挖角」，未必是明智的做法。

三份英文報紙的編輯均認為九七不會為報業帶來太大的壓力

關玉慈留意到英文報紙場的萎縮，但她認為「南華早報」繼續領先的地位，不會受任何威脅。她說：「我們是第一的，「虎報」只是第二（poor number two），「東方快訊」就更不用說了。」

根據ABC(Independent 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最新的統計，「南華早報」於今年上半年，創業績新高峰，每日銷售量超過十萬份，比上年同期有百份之三點七的增長。

在市場方面，「南華早報」擁有八成的讀者，「英文虎報」和「東方快訊」各佔一成。

雖然如此，鄭偉鳴稱「虎報」已經開始有盈餘，今年度更有百份之三十的增長。他稱憑著星系集團的財政支持和其報業的業績增長，「英文虎報」一定能繼續經營下去。

「東方快訊」雖然創辦不足一年，但已虧損了超過千萬；而最近一連串的公司內部行政糾紛，引致大量人才流失；這些現象引起外界對這份報章的命運有不少負面的猜測。不過，據兩位人士透露，東方報業集團主席馬澄坤已多次向董事保證會全力支持「東方快訊」經營下去。

為求生存，各施各法

為了增加報紙的影響力和鞏固其地位，「南華早報」和「英文虎報」先後在大陸設置印刷廠。在去年九月，「南華早報」增設中國版後，估計在國內的銷售量會由五千份增至八千份。但正如孔文添所言，中方只會在英文報紙沒有廣泛地被內地人士閱讀的[illegible]自由。那麼，英文報章在內地會遭遇到甚麼困難？

曹捷表示不會因中國大陸有十億人口而產生幻覺。他說十億人口中，有三成是文盲的，餘下的七成中，外商和有英語基礎的僅屬極少數，英文報紙很難打入大陸市場。

他指出，所有在內地受歡迎的報章都會被中方控制其發行量和內容，因此他說：「在大陸設置印刷廠發行英文報章等於『慢性自殺』」

曹捷透露，「東方快訊」除了增加中國報導外，會引入多方面的評論，包括親中和與中方對抗的言論，他認為新聞價值才是優先考慮的條件。他又稱，由於香港人均傾向於追求新穎及採取較開放的態度，「東方快訊」將繼續其出位的作風。他說：「『南華早報』的報導過份保守，擁有龐大的市場只是因為讀者已經習慣了它的模式。」

關玉慈則認為「[illegible]」，南華早報會重新衡量應採取的戰略，加倍留心一切中國因素是明智的。她稱「東方快訊」只想表現出獨特的風格，希望有異於「南華早報」，卻不知應採取的戰略。

基本法—樂觀？悲觀？

關玉慈對基本法承諾之一的言論自由表示樂觀。她指出中國的影響力雖大，但基於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和經濟中心，全世界各國均注視其發展，所以，中方絕不會「輕舉妄動」。

但鄭偉鳴表示，雖然基本法經已許下給予港人言論自由的承諾；但最近的席揚和高瑜事件，反映出中方和香港傳媒的關係並不理想。他指出，除非香港和大陸在經濟上有穩定的發展和沒有太大的政治動盪，否則基本法的承諾只會落空。

總括而言，三份英文報章的前景樂觀與否，全賴其市場潛力。有不少人推測，「東方快訊」會因經濟理由而被迫停辦；但會否正如曹捷所說，「南華早報」選擇保守路線，「東方快訊」有「出位」的特色，而採取較「模糊」路線的「虎報」可能會是第一份被市場淘汰的英文報章？那就得拭目以待了！

香港傳媒老闆轉軚分兩種

汝不知夫螳螂乎？
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也。

林育慧

距香港回歸中國的日子尚有九百多天，中英雙方不斷在政治層面會談、商討，務求於九七年香港可以順利過渡。然而，在這段後過渡期間，新聞傳播媒介亦面臨巨大的考驗。

最為人談論的是無線電視台禁播「毛澤東特輯」、亞洲電視台的「六君子事件」，以及明報記者席揚事件，令人擔心九七年後，新聞工作者會否受到更大的限制，傳媒老闆（媒體擁有者）會否因政治關連不自覺地自我轉軚？又或對編輯增加以干預？新聞編採部的自主權能否獨立呢？這些問題都受大家所關注的。

編採部門受干預的隱憂

接二連三發生在新聞傳播媒介的事件，加上在這個敏感的過渡期，難免令市民擔心香港新聞傳媒會否因政治壓力，而在立場上有所改變。最令人憂慮的是傳媒老闆，因傳媒所有權者及擁有媒體之大部份股份者，會否干預享有獨立編輯及採訪權？節目主持人黃毓民認為媒體所有權者對於編輯部的干預，無論是出於政治或經濟理由，一律不會贊成。

從政治角度而言，黃毓民關心的是中方的態度。即使中方並沒有直接或間接的施加壓力，中共方面亦會對香港的新聞報道或評論作出揣測，這時傳媒老闆（媒體擁有者）或會作自我檢查，因此，老闆如在政治上加以干預，主要也是中共因素，這是令人擔心的。但目前仍然未有具體事實支持傳媒老闆因害怕中共，而干預編採部門工作的，這是一種隱憂。

黃毓民不擔心九七後香港新聞自由會受影響。

對於明報記者席揚事件，無線電視台禁播毛片及亞洲電視台的六君子事件，黃毓民認為不可能完全說明傳媒擁有者（Media Owner）是對編採部干預。無線電視台向ABC電視台購買了毛片而不播出，這是節目部之節目，跟新聞部沒有直接關係。引起大眾的爭議，主要是在這個敏感時期，市民會以為電視台不希望得罪共產黨而作自我檢查。對於這種看法，黃毓民認為未有充份理由，但亦不代表沒有可能。

[illegible]明報向北京認錯，黃毓民認為此乃為營救記者的權宜之計，並不可以說是轉軚或干預。但亞洲電視的六君子事件，[illegible]輯與否，導致管理階層跟編採部門有不同看法，是直接干預編採部門，這種干預[illegible]有關。

編採部自我檢查及自律

[illegible]Media Owner)會否因[illegible]無論是害怕中共或討好中共）而干預編採獨立？但黃毓民強調這[illegible]

[illegible]干預編採的程度並不嚴重。電視

台就不以新聞為主，乃以娛樂為主。反觀報紙的編採部門或撰寫社論的人，卻有自我檢查（Self-censorship）的現象出現。

黃毓民指出自我檢查（Self-censorship）及自律（Self-regulation）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們經常要求報紙及雜誌自律，不刊載一些會引起社會恐慌或令人感覺不舒服之內容，例如一些敏感的內容是不應該渲染的。黃毓民認為對傳媒要求自律，純粹從社會責任角度出發，並非限制傳媒內容，這是兩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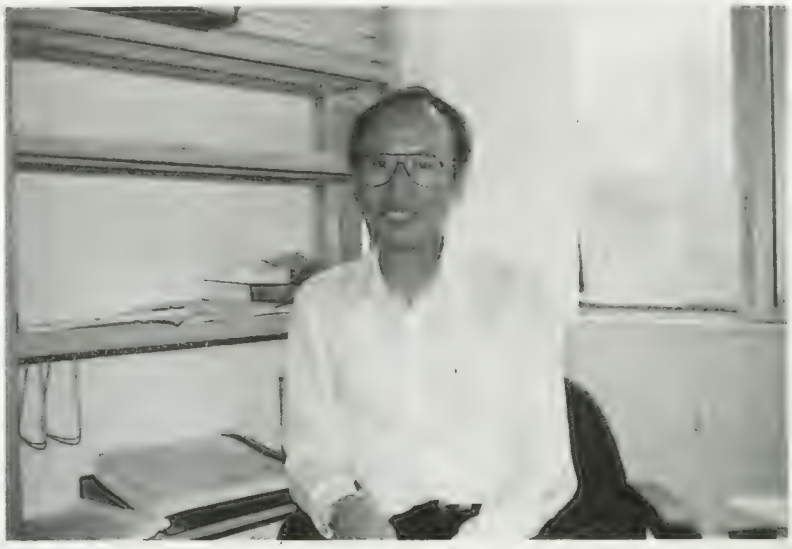
不過，假若因政治理由，無論由於中共因素或港英關係，而有自我約束的現象出現，使事件未能全面地報道出來。這種自我檢查方式，黃氏認為是不要得的。

「我們應贊成對社會負責的自律，但反對因政治理由而自我約束，令與公眾有關的新聞報道被歪曲。」

九七前後新聞自由變化

許多人擔心在九七年後，香港的新聞自由會有問題，一項調查顯示，六成市民認為未來三年的新聞自會減少，表示他們對前景偏向悲觀。但黃毓民則不擔心九七後香港的新聞自由，反而九七前的日子更為複雜。

「我並不擔心九七年後的發展，當有人向我們施壓力時，唯一可以做的便是反抗，新聞工作者與之鬥爭。現時是屬於投降、自動禁聲的時期，新聞工作者已自動收聲，縱使中共政府未有施加壓力。從氣氛亦可感覺到，報紙報道已有偏向，只報道部份的消息，使市民不能全面地知道事實的真相。」



黃煜認為傳媒老闆轉軚有兩種。

對於新聞自由看法，黃毓民認為沒有樂觀與悲觀之分，這是與制度及社會發展有關。「香港傳媒的運作方式，百花齊放的制度是不能改變，現時只是逆流。我希望九七之後，假若特區政府以行政手段加強對新聞干預的話，定可激起新聞工作者的反抗、鬥爭。在這過程中亦可以反省。」

傳媒老闆轉軚可有兩種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講師黃煜則認為，九七過渡期間，假若香港傳媒老闆真的「轉軚」的話，也是一種趨勢。他指出「轉軚」也有兩種，一種是媒體直接由中資買股份般買過去；另一種是基於商業上的考慮而「轉軚」，可能影響新聞自由。

黃煜強調，縱使「轉軚」也不是從政治層面上出發，主要是經濟上的因素居多。現時傳媒當中已有這個趨勢，但並不太明顯，因此可以說不會有完全轉軚情況出現，除非九七後共產黨自辦一份報紙，否則這個情況是不會出現的。

為了主張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黃煜認為北京不可能將香港的言論自由壓下來，因為北京需要有限言論及新聞自由，用以宣揚一國兩制，因此新聞自由至九七後會有影響，但不會太厲害。

目前香港傳媒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批評，或保障公眾的言論自由已受到考驗，電視台已受到政治考慮而不能或不敢發表敏感意見，或表達意見已愈來愈困難。黃煜指出電視台的專題節目也愈來愈難於帶出問題，只能集中在「今日睇真D」及「城市追擊」節目上，因此兩個電視台的節目影響較大。

九七後的新聞自由，黃煜表示必定少一點，中共的管治會影響香港新聞自由，黃煜指出公開的聲音挑戰較難，個人的意見尚且可以發表。而新聞分析及言論分析則有變化，例如政治與中國有關的批評比過去少，或許北京在香港另辦一份報紙，以表達官方言論。

綜觀而言，九七後在這段過渡時期，傳媒老闆會否「轉軚」，至今仍然有待觀察。至於本港新聞自由，看來要靠新聞工作者全力爭取，方才有顯著效果。

「九七」前後文字媒介的

編輯權誰屬？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李珮華

去年《東方快訊》的「橡皮圖章」事件，因管理階層干預編輯修改記者稿件的權利而備受關注。此事不但導致該報勞資雙方發生衝突，亦因而令人懷疑編輯權誰屬的問題，加上九七逐漸迫近，編輯的日常工作及權利會否更受限制？

華僑日報副總編輯張結鳳表示將來的編輯權乃在乎政府方面的政策，而非在各報館身上。

編輯基本工作

信報總編輯沈警岳指出，編輯一般的工作包括編和輯。所謂編，是根據當日所得新聞的重要性而決定那段合用為頭條新聞；而輯，則是修飾文字，並看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他又指出，編輯正如一位廚師，以記者採訪所得的資料來烹調，並決定誰是主菜，誰是配菜，而各編輯每晚亦會開會，決定各條新聞的編排及程序。

華僑日報副總編輯張結鳳認為，各版面編輯大多屬於技術性的工作，他們需要在短時間內處理及計算每張的字數，編排圖片的位置和製作流暢及精簡的標題，對內容則沒有太大的控制權。此外，他們只會因篇幅所限而刪減文章，而不會對稿件大動手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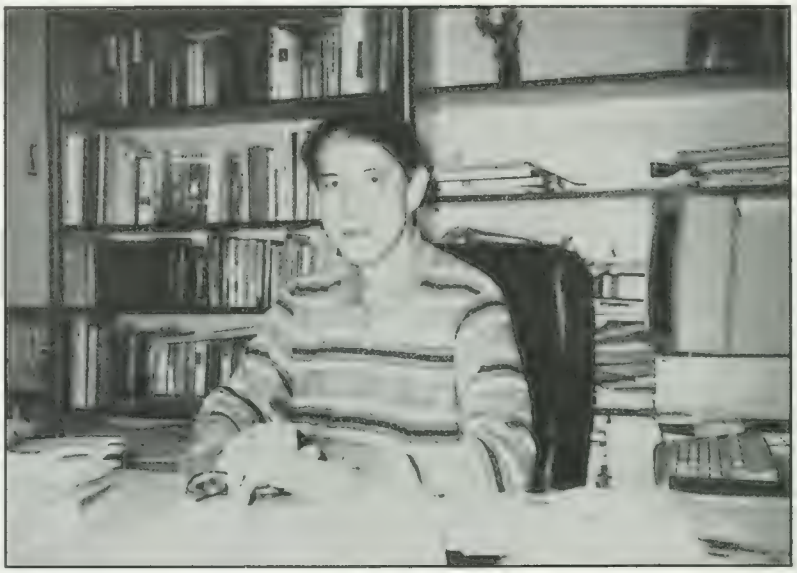
張氏並覺得作為一個編輯，應對版面內容有充份的認識，例如中國版的編輯便應熟識中國的情況；另外，他們亦應擁有良好駕馭文字的能力；非有豐富的新聞經驗；最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美術眼光來判斷文字與圖片是否配合。

什麼是編輯權？

至於編輯權問題，張結鳳表示，因任何文章的錯誤均會歸咎於總編輯身上，所以「我們不能指出編輯有何權利，他們當然可以提出意見，但最後的決策權仍歸總編輯。」而總編輯則會依報館既定的風格、政策及政黨立場監督的責任。

對沈總編輯而言，編輯權即表示編輯可修飾文句，並能按事實

來修改稿件。若發現記者所報導的有遺漏或有其他人作出反應，編輯有權加以補充；若遇上篇幅不夠，編輯亦有權刪減文字。以往，因為記者會按著倒「角形式的新聞寫作方法（即把重要的資料放在首數段）寫作，所以編輯多只會刪去尾段，但因時代改變，新聞寫作要求全文結構緊密，前後亦有其重要性，所以編輯要在不影響文章的完整性下刪減文字；此外，他們也可對新聞事件加以評論，或加上個人的意見，但這意見當然不能當為被訪者的說話。



信報總編輯沈鑒治對九七後的編輯權甚具信心。

編輯權受干預？

對於管理層干預編輯權一事，沈氏表示，除非報館老闆與編輯同屬一人，否則管理層不會干預編輯事務，而在每晚的會議，編輯也有足夠的自主權處理各段新聞。然而，如果編輯犯了錯，便應付出代價，「犯上小錯誤有小的代價，大錯誤則應付大的代價」，這要視乎不同報館的政策。

張副總編輯亦指出，每日有不同的事件發生，編輯每晚也要開會討論，並按事情發展作安排，所以除非管理層每晚都在報館監管著，否則根本不能干預日常編輯的工作。但若編輯把稿件修改至與原意不同，或與事實有偏差，這當然要按錯誤程度作交代，然而這情況只是大家理解上出現問題，與編輯權無關。到目前為止，她們未曾受董事局干預編輯事務，但將來的事則難以保證。

另外，她認為影響編輯權的外來因素可能來自經濟、報館老闆及政治方面。她不排除有些報館老闆會為了生意著想，讓新聞與廣告掛勾，特意討好某些人，從而得到更多廣告收益。又有些老闆會因為自己在報館的地位而出手干預編輯事務。政治方面，她認為擁有政治背景的報館的編輯權受影響較大，例如一些親中的報館，老闆及編輯有較多的政治考慮。

事實上，張氏認為中文報紙的編輯需要在短時間內計字數，修改文字和突出重點，所以甚少會注意立場及內容問題。而因不同報館有不同的風格，編輯當然要接受該報的一貫作風才會加盟其中。

然而，一間報館受影響，不一定是受外來的壓力所致，她以《現代日報》於去年十一月倒閉一事為例，指出商業的考慮也不可忽視。

編輯權仍存在

「九七」迫近，張副總編輯表示當然希望不會有編輯權受干預，但假使幾年後編輯受到政治問題或外來壓力影響，她卻不能預料到。況且將來有關編輯權的存在問題，是在乎特區政府方面的決策，而非落在各報館身上。

沈鑒治亦指出，很多人擔心九七之後會怎樣，但他相信無論在「九七」前後，編輯權不會有改變。他表示，新聞其實也像一盤生意，生意投資當然會有風險。正如錢財要靠我們努力賺取而非從天上降下來，新聞自由也不會無緣無故而來，非靠我們努力爭取不可。

他說：「若沒有人取去我們的權利，我們亦不可放棄，且要繼續爭取。」

他又表示，根據基本法所載，編輯權在九七後不應有限制，即使有限制，也只是一些新聞工作者應遵行的守則（Code of Ethics），例如：不可誹謗或人身攻擊等，而這些是編輯基本應該遵守的。

沈總編輯最後謂：「相信無論九七前後，編輯權仍會落在編輯身上。」

夕陽自是無限好，只愁長夜難消磨

香港需要一份老人報

王岑

曾想過他朝退休後的生活將會是[illegible]的呢？如有，你理想中的[illegible]？或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香港傳播媒介歪風正蔓延

誹謗與收買新聞之風不可長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葉富喜

為了爭取讀者，增加銷路，不少報章刊物都採取誇張失實，譁眾取寵的方式報導新聞，有的甚至于誹謗學者或社會知名人士，刺激銷路。前些日子，《東周刊》就因刊登了一篇誹謗經濟學者張五常文章而上了法庭。

* * *

據《東方日報》報導，該篇文章刊登于九一年十月四日第十五期《東周刊》。內容提及當時港大校園正流傳著一些謠言及張五常家事糾紛的單張以及張氏剛獲選香港大學最差教學獎，並指張氏面對這些不利傳言時採取了「沉默是金」的態度，其中包括傳媒指其「缺席」及「拒絕」與系內學生合拍集體照等。

面對著這些不利報導，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張五常教授表示，對於一位學者而言，學術操守非常重要，但《東周刊》卻指他未有盡心教學，對他是很大的侮辱。

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以及討回公道，張氏決定控告《東周刊》誹謗他。

他表示「士可殺，不可辱」這三十年學術生涯所賺回來的名譽是他的資產，對於這種明顯不過的誹謗，難怪他採取行動。

經過一段時間的的審訊，張氏獲判勝訴，《東周刊》須賠償一百四十萬元以補償張氏名譽上的損失。

* * *

張五常教授因被誹謗獲得賠償，但相對於張教授，郭太的遭遇就淒慘得多了。

據一名《星期日南華早報》記者透露，郭太乃一間介紹印尼女傭公司的僱主，主要業務為介紹女傭給僱主，從中抽取佣金。

為了爭取更多的客路，郭太曾邀請一些朋友幫助她介紹女傭給其他人，而每位介紹人均可收五百元介紹費。

郭太的其中一位朋友原為保險經紀，也替郭太介紹女傭，但該位朋友嫌郭太所給的介紹費太少，要求由原先的五百元增至一千元，但郭太不肯，二人因而交惡。

郭太謂，為了報復，該朋友便聯同一名記者，揑造新聞誹謗郭太。

首先，該名記者於報章上刊登一則新聞，指郭太的公司所介紹

的女傭會提供額外服務，並叫某公司「掛羊頭賣狗肉」，這個女傭自然，不會做這事。

然後，又有這新聞，指新大戲女傭打主人，電視台、報紙大幅報導，加強渲染效果，文強已變相審，法官大可以從中聽取證供。

新大在沒查清事件前，必先入為主，主觀地報導新聞，可能犯誹謗罪，新聞報導無罪，但無辜者已受害大大，難以了了之。

新大的登報聲明，也等於承認報導錯誤，但被害者已受害大大，難以了了之。

新大聞是此事件中唯一名譽受損者，為公司主管帶來「麻煩」。

* * *

不過，即使新大打官司贏，除了要使用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外，且無絕對勝訴的把握。因為報導不等於評論，事實陳述不容歪曲，但意見則大可主觀，基於事實加以批評，不論褒或貶，而且，本港承襲英國的傳統，對於公眾人物容忍程度，遠高於普通人，為的是為了公眾利益，是故容許公眾人物被批評。

然而，除了誹謗新聞外，最近傳媒爭相以金錢吸引「名人獨家」，例如，女星鍾楚紅的「[illegible]」新聞就手段惡劣。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講師黃煜表示，新聞是不可用金錢買回來的，因為如果在金錢的引誘下，許多人都可能會出賣一些原本不會報導的事。

「如果有金錢可以買到的話，有人可能會為金錢出賣他的家庭或金錢，就以鍾楚紅的事件為例，許多地方都是不合理的。」黃氏說。

黃氏又表示，這種辦報求利的報導，法庭在這要不得的。

此外，香港記者協會會長[illegible]表示，傳媒在報導一些新聞時，應該要先確認所報導的新聞是否合理和真實，而且要以專業角度。

記者每日要寫很多，誹謗是很多原因，要是真報道錯某些事，某些生活受影響，那是真報錯某些事打官司，某些生活影響，這都很有可能，不能令真報作費大事宜。

假如有人，故意的誹謗，也可以傷我的事情控，那名譽上，錢也可以賠很大很高年，那些誹謗可確成的事實嗎，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很清楚的界定，如有引致公眾秩序受破壞的危險，非常嚴重的，為了公益而作的事檢控的誹謗，會不會罪名成立，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行政機關，及法庭所持的態度，真實現在，在美國及香港，用事檢控誹謗，是絕無僅有的事。

香港傳媒歪風正在蔓延

『脫離英國、接近中國、雙互發展』本港會計師行積極在中國發展業務

曾靄英

自七九年中共改革開放以來，本港會計師事務所紛紛在大陸各地設立辦事處，積極培訓人才，藉此提高他們在國內的工作效率，進一步拓展業務。同時，香港會計師公會正準備明年與英國會計師公會脫鈎，銳意開拓國內市場；而本地大學也正籌備長遠發展課程，並舉行更多中港學術交流，加強兩地會計同業的溝通。

中國會計體制國際化

在一九七九年中共改革經濟體系後，實施以市場爲導向的轉換企業經營機制，不但吸引了大量外資在華投資，也推動中國會計體制趨向國際化；至一九九三年國務院財政部實施《會計法（修正案）》，進一步促成中國會計制度的國際化。因此，國內大量需求符合國際專業資格的財務人員，造就本港會計師事務所紛紛在國內建立辦事處，承辦國家委派、或私營的合資企務。

世界最大的會計市場

香港理工大學會計系講師游紹永指出，一九九四年中國擁有[illegible]千名註冊會計師工作人員。在那[illegible]上述單位或機關工作的只佔百分之[illegible]，其中[illegible]，具有中專或專上學歷的只佔百分之三十，現時憑學歷和經驗評聘爲註冊會計師只有一萬人，會計師廿七萬人，助理會計師七十五萬人，會計員一百一十萬人。估計急於接受基礎正規培訓的財會人員可能有七百五十萬人。因此他相信中國會計師行業，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市場。

畢馬域會計師行商業發展部經理李陳佩慈也指出中國在廿世紀經濟增長強勁，是一個長遠投資發展的地方。她並表示：「我們不能錯失這個投資發展的重要地方。」

各自發展國內根據點

早於八十年代初期，本港七大會計師事務所已紛紛北上，在國內成立辦事處。據游紹永指出，容永道會計師行可算是「先頭部隊」。

至九二年中國財政部批准國際會計師行以合資形式，與中國財政部屬下的會計師事務所合作，

游紹永估計中港會計同業可以雙互發展。

七大會計師行在國內合夥單位情況			
名稱	國內合夥單位	國內辦事處	國內員工數
安永	華強會計師事務所	北京、上海、[illegible]	[illegible]
安本	華洲會計師事務所	北京、上海、[illegible]	[illegible]
畢馬威	華振會計師事務所	北京、上海、[illegible]	[illegible]
德勤	大華會計師事務所	上海、北京、廣州、[illegible]	[illegible]
德勤	德[illegible]會計師事務所	上海、北京、大連、廣州、深圳	[illegible]
羅兵咸永道	中信會計師事務所	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深圳	[illegible]
關黃陳方	蛇口信德會計師事務所	深圳、北京、上海、[illegible]	[illegible]

資料來源：信報

成立認可的合作會計師事務所。李陳佩慈指出她們是首間獲中國財政部批准的會計師行，並於一九九二年二月在中國成立「華振域會計師行」。

七大國際會計師行分別在北京、天津、上海、廣州及深圳等五個最多外商投資的城市設立合作會計師事務所，估計廈門是下一個吸引國際會計師行設立的城市。目前，本地會計師事務所多採用「合資企業」、「合作企業」及「外資企業」等三種經營方式，主要提供替客戶在中國成立公司、稅務諮詢和協助客戶遵守有關稅務規定、審計與會計及其它一般商業顧諮詢等服務。

除了服務「三資企業」客戶外，這些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也積極爭奪國企上市的審計及股份制成立的客戶。

肩負培訓人才的工作

朱鎔基副總理早前指出，中國最少需要四十萬名會計師。雖然中共已注重研究培育工作，分別在國內六所高校，包括最著名的上海財經大學，頒授會計博士學位；但由於本港擁有較高質素的專業會計人士，故負起培訓內地人才的工作。目前本港七大會計師事務所平均約有一百五十名僱員。他們每次約遣派百分之十本地人手北上進行培訓工作，其中多為資深會計人員。他們會視乎不同的工作性質，每次約逗留兩星期至半年不等。

李陳佩慈表示，她們在國內進行審計賬目工作，獲得利潤不比本地高。因為會計師行需要額外支出本地員工的住宿、交通及通訊等費用，還要增加膳食及其它津貼，因此她們視這項在國內工作為長線投資，希望藉此開拓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市場之一。」估計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需要增加約百分廿至三十的經營成本，才能支持在國內投資活動。

會計師公會推行新制

針對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香港會計師公會也擬定一套由一九九四年至二零零一年的長遠發展策略：包括在一九九八年與英國會計師公會脫鈎後改革本港現有會計考試制度，規定非大學會計本科畢業生需先參加一個轉換課程，才能參加會計師專業考試；身兼「香港會計專業人員協會」創始人之一的游紹永指出，他們希望於一九九八年後，非大學畢業生需先有「香港會計專業人員協會」考獲認可資格，再考取本地認可的專業會計師資格。預計整個新會計制度，可望在二零零一年推行。

他又指出香港會計師公會已先後[illegible]與英國、[illegible]方面，要求確認本港會計師於九七年後的專業資格；又不斷舉辦研討會，推動本地會計行業的發展。

本地大學加強學術交流

本地大學方面，以香港理工大學會計系為例，游紹永指出九五年，提供有關中國會計制度的科目，加強會計系本科生對中國會計制度的認識；又曾於九零至九一年度，組成學生交流團；並接待上海財經大學的教授和研究生等來港互相交流；又曾聯同廣州中山大學舉辦研討會等等，藉此加深兩地學術、經驗交流。

游紹永估計未來十年內，中國[illegible]要求；惟至公元二零一零年，則會達飽和階段；甚至中國可能會輸出內地會計專業人才來本港的情況。

他說：「脫離英國、接近中國、自主獨立、雙互發展。」來總結九七年以後的中港會計專業的情況。

“九七”之後
深圳不可能替代香港經濟地位
—唇齒相依，同步發展，相輔相承

黃志釗

香港與深圳在地理上非常接近，發展模式與經濟結構亦十分相似；深圳經濟正在起飛階段而香港經濟上受到政制及其它方面的阻礙，深圳會否取代香港的經濟地位？而“九七”後香港回歸中國，在經濟上會與深圳維持著甚麼關係？這是本文將要探討及分析的課題。

八零年代，中國推行對外開放政策，經濟方面更致力對外開放，吸引外資，直至九十年代，中國被認為將會在國際經濟市場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事實上，中國近年來在經濟上的發展日益蓬勃，尤其是沿海地區，例如深圳、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上海及廣州等。其中的深圳，近年來的經濟發展驚人，一九九三年，深圳被選為全國第五經濟最強的地區，緊跟上海、北京、廣州及天津之後。

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在深圳成立經濟特區，採取對外貿易開放政策，規劃三百二十八平方公里作為深圳特區，而現在已經擴展至二千零二十平方公里，証明了深圳在經濟上的成就，實在是不容置疑的。在經濟發展的熱烈需求下，中國於一九八四年又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等地區劃為沿海經濟開發區。中國有此決定，在某程度上是由於深圳經濟開放的成功所致。

經濟增長驚人

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的資料：一九九三年深圳的國民生產總值比過去一年上升了三成，而平均國民收入達二千六百美元，是全國國民收入最高的地區。工業方面，一九九三年深圳的工業生產總值更上升三成半，而當中主要的工業種類分別是製衣、建築材料、電子、鐘錶、玩具及輕工業。九四年初，深圳領導單位更打算提升工業結構，經營一些新的及高科技的工業，如能源產品，汽車及通訊器材等。

出口貿易方面，九三年深圳的出口上升了超過五成，達到七十八億美元；並且取代了上海，成為全國最大的出口地區。而入口更上升了超過一倍，達六十一億美元。

改善對外交通

內部建設方面，深圳致力改善交通網絡，現時九廣鐵路可到達深圳市，而廣深鐵路也經已完成。此外，深圳更發展鹽田、赤灣等八個港口，當中有九十二個碼頭，包括二十個深水碼頭，九三年處理達到十二萬八千個標準貨櫃。

一九九二年，深圳黃機場投入服務，迅速地成為全中國第六大最忙的機場，九三年乘客超過二百五十萬人。

港商投資熱烈

深圳經濟急促膨脹，外資是一個主要的因素。到九三年六月為止，在深圳的外地投資者當中，香港投資者佔七成之多，總共有六千個投資計劃，主要投資酒店、地產、製衣、電子、鐘錶及玩具等。而近年來，香港的企業亦開始投資在深圳內部建設方面，如香港國際貨櫃在鹽田港口投資數十億元。深圳在多方面改善其條件的情況底下，當中國收回香港後，深圳會否取代香港的經濟地位呢？

三個發展階段

香港浸會大學商務學院經濟學系高級講師曾澍基認為，深圳是中國對外開放政策底下，最早發展自由經濟的市鎮之一。曾澍基指出，中國的經濟發展情況，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八

零年代初期，乃是一個探索期，中國的投資者只是抱觀察態度；第二個階段是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香港問題得以解決，加上當時香港的經濟反彈，很多港商開始在內地作大規模投資，[illegible]時期是九二年鄧小平南巡，確定開放改革路線，各地都開始發展基本建設及長遠投資，如建公路、機場及港口等。但隨著經濟發展，深圳的勞工成本上升，很多外資開始在其它地區發展，如珠江三角洲。所以深圳的發展成就，只是相對於其它地區來說的一個時間差的分別。

經濟三面受敵

曾澍基又指出，深圳的競爭力在多方面受到削弱，在勞動力方面，過往深圳是中國規定的經濟特區，未受到其它鄰近地區的挑戰，但隨著鄰近地區的發展，如珠江三角洲地區，深圳的勞動成本相對地比其它地區為高，在這方面對深圳是不利的。

為了解決勞工成本問題，深圳亦開始嘗試發展其它地區沒有的高科技工業，但這方面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為深圳的工業主要是由香港及台灣投資興建，所以工業的類型與香港及台灣相類似。另外，曾澍基指出，因為投資高科技的資金龐大加上香港及台灣本身亦沒有發展這種類型的工業，再加上深圳沒有工業基礎，勞工技術不足，在這些限制底下，深圳投資高科技工業的可能性是不樂觀的。

股市方面，深圳的股票市場吸引力不足，原因是鄰近的香港已經是世界知名而龐大的金融中心，而上海也是中國重要的金融城市。曾澍基指出，在東南亞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便會考慮在上海上市，最後實力較差的股票，才會在深圳上市。因此，深圳股票市場在上海與香港的威脅下，實在是兩面受敵，要衝破這個障礙，實在是非常困難。曾氏最後說：「真正威脅其實來自上海而非深圳。」

基建與經濟不配

曾澍基又指出，深圳的經濟發展可以說是香港的濃縮版本，而且非常迅速，由第一產業到第二產業的發展時間很快，所以基本建設是不足以配合經濟的發展。

他指出，在特區發展的初期，深圳的單位領導人只知道跟隨香港的發展模式便可以使經濟繁榮，但因為速度太快，缺乏長遠的規劃，令基本建設遠遠落後於經濟發展的需求，而本來只需要加緊建設，問題或可解決，但中國現時全方位對外開放，使深圳陷入受到鄰近地區有利條件的威脅[illegible]，深圳對內缺乏基本建設，對外受鄰近地區發展的威脅。曾澍基指出，深圳在某程度上似一個暴發户，缺乏長遠規劃，外強中乾。

所以，在勞動成本高企，不能發展高科技工業及股票市場[illegible]方面的困難底下，加上中國現在的全方位對外經濟開放，深圳經濟特區的相對優勢已大大減弱，這三方面對香港沒有很大的威脅。

曾澍基指出深圳與香港的競爭主要集中在貿易方面，[illegible]香港的基本建設，如道路，水道及港口等都比內地健全。在地理上處於極有利的位置，因此香港成為了轉口貿易的集中地。[illegible]深圳發展基本建設，如黃田機場，[illegible]香港為低，據估計在鹽田運作一個貨櫃碼頭只是在香港發展的成本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香港因為政制爭拗的影響而受阻延，基建未能按步完成的情況下，有部份原本在香港的轉口貿易會分流到深圳，而曾澍基指出，一旦貿易分流就很少機會回頭，雖然香港現有的轉口生意未必會受到影響，但估計一部份新增的生意會被深圳所吸收，不過只是分流作用，不會取代整個轉口貿易。而分流的多少，很大程度上是要視乎香港基建的快慢。

深圳納入香港經濟

展望"九七"後，深圳會否取代香港經濟地位，曾澍基認為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勞動成本方面，受到鄰近地區"廉價"勞工的威脅；高科技工業發展困難；股票市場受上海及香港威脅。只有轉口貿易能威脅香港，而且只局限於貿易方面的情況下，是沒有可能取代香港的。

曾澍基又認為，深圳會否取代香港，不能用"九七"作為分界線，只可說因為政制問題簡接地影響現時香港基建的進度，令轉口貿易分流，在貿易上，對應"九七"或會有些影響。

根據統計處的資料，九二年全年深圳和香港之間的汽車流量為[illegible]多萬輛次，比一年前增加了六倍。而根據恆生銀行經濟研究部的調查，現時香港的國民生產總值[illegible]，有超過[illegible]與中國有關的，比八十年代增加超過六倍之多。反映出香港與深圳在經濟上是唇齒相依，而且是同步發展的，相輔相承的。

大亞灣核電廠會否受鄰近地區地震影響？

「迨天之未陰雨，宜未雨而綢繆」

陳健民

大亞灣與香港只有五十公里的距離，假如大亞灣核電廠洩漏幅射，一日之內便會波及本港，其中一個可能導致核電廠洩漏幅射原因，便是鄰近地區發生地震。

海峽地震引起關注

天文台及地質學學者對於大亞灣核電廠會否受鄰近地區地震所影響表示保留，但認為香港受地震直接影響的機會很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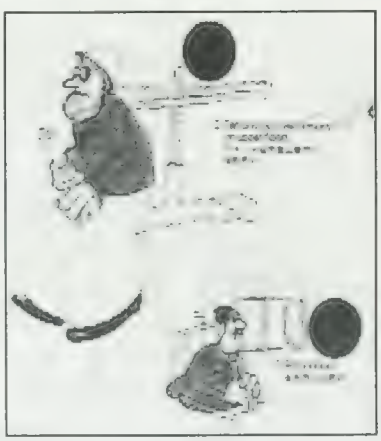
九四年九月十六日，台灣對出海峽發生六點五級地震，震央距離本港約四百多公里，但當日不少市民都感到有輕微震動。

強度烈度計算不同

根據天文台所發出的指引，現時量度地震是採用地震震級和烈度兩種計算方法

地震的震級是由標準儀器所紀錄得到，地殼運動的振幅及週期而估計出來。『震級』表示由震源釋放出來的能量，所以每次地震的震級數值只有一個。

至於某地點的地震烈度則表示地震引致該地點地殼運動的猛烈程度，地震烈度由震動對個人、傢具、房屋、地質結構等所產的影響來斷定。因此某地方的地震烈度是受某地與震央距離及該地點本身的土壤結構有關。



地震烈度二至三度的情況

現時本港將地震烈度分為十二級，第一級是完全感覺不到，十二級則是全面損毀。天文台將九月十六日香港所感應到的地震烈度定為二至三度

個別地區震幅較大

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在該次地震後作過一次問卷調查，發現中環及長沙灣等地區對地震的感應較大

負責該項調查的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講師陳龍生表示，由於上述地區是填海區，或是屬於沙質地基，因此震幅較大。

本港地震機會不大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譚焯明指

出，本港主要受兩條地震帶所影響，一條是位於南中國海，即今次地震帶，距離本地約四至五百公里；另一條地震帶是位於內陸的海峰地震帶，距離本港約二至三百公里。

譚焯明認為，在本港境內發生地震的機會不大，即使受鄰近地區地震影響，天文台有紀錄以來只有一九八年曾錄得地震，當時錄得本港地震烈度為八至七度，未有構成破壞。

核電廠會否受影響

天文台位於香港的氣象大樓台址公里，距離海峰地震帶大約一百五十至二百五十公里，換句話說，受地震威脅的機會也相對增加。

天文台方面表示，由於沒有[illegible]廠承受地震幅度的資料，因此不能估計核電廠會否受地震影響而[illegible]，惟如可信大[illegible]亞灣核電廠可以承受大約地震烈度七度的震幅。

[illegible]在活動地震帶上的樓房都設計到能夠承受八至九級地震烈度。」[illegible]，[illegible]香港[illegible]有特別為防止地震作設計，但核電廠不應只能承受七級烈度。

天文台方面認為在香港境內地震機會不大

天文台有紀錄的資料顯示，[illegible]年曾經錄得，香港錄得[illegible]震烈度是大約五至[illegible]級，[illegible]會很大

「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

中國、香港對人口生育政策不同

中國單生人口政策不可謂「常」

梁英傑

今日中國大陸的人口已經接近十二億，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原因是五、六十年代，毛澤東提出的「人多好辦事」口號，導致那時國內人民無計劃地大量生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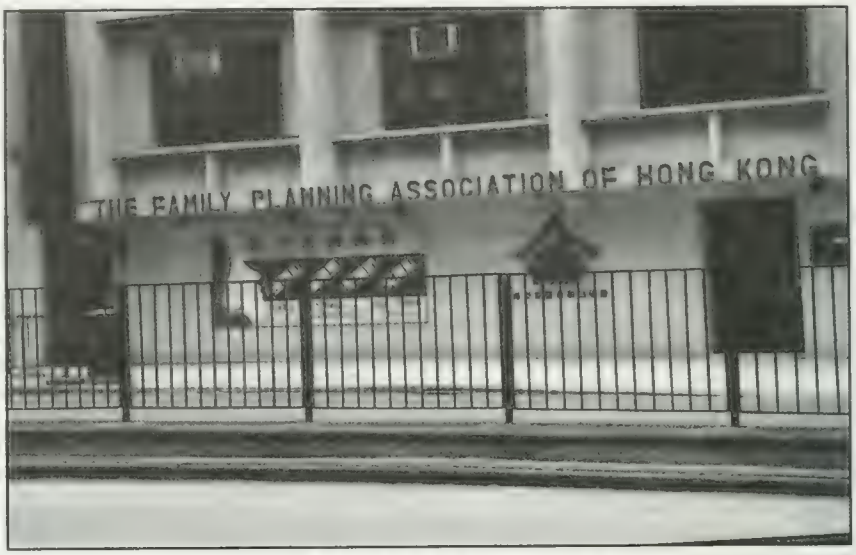
當時，北大校長馬寅初已經洞悉人口過多對中國的害處，並提出警告。但可惜並無人理會，馬寅初其後更遭到批鬥。但他所提出人口過多的害處，現時都一一顯現出來了。

人口過多的害處

一本中國大陸鄉鎮計劃生育幹部培訓教材中提到，人口狀況與實現現代化存在著尖銳的矛盾。首先，雖然中國工農業的總產值劇烈增長，但由於人口增長過快，所以若總產量按人口平均佔有量計算，增長便極為緩慢。

由於人口激增，國家要拿出一部份資源供應新增的人口，以致資金不能積累。

此外，人口過多亦帶來就業、教育等問題，令到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有太大的改善。因此，中國政府推行計劃生育。



家計會表示會根據基本法的條文辦事

計劃生育政策

計劃生育所提倡的是：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和優育。而其中最積極推行的就是少生一項。

國內夫婦都被提倡只生育一個孩子，而要經過審批才可以生育第二名子女，亦嚴禁生育超計劃的第三胎。

據中文大學社會系副講師陳健民表示，計劃生育在國內各大城市嚴格地執行，但在農村地區則比較寬鬆。

陳健民說：「在城市的國營工廠，每年都會有一個由國家發配的生育額，再由工廠單位分配給工人中的年輕夫婦。若有工人不依配額胡亂生育，不單會被解僱，甚至工廠單位亦會被罰。」

但是農村的情況並沒有城市那麼嚴格。農村夫婦通常都可以生育兩個子女。亦有城市夫婦多生了子女，而把孩子放在農村的親戚朋友家中寄養。可是這些計劃以外的孩子便喪失了由國家提供的教育、醫療等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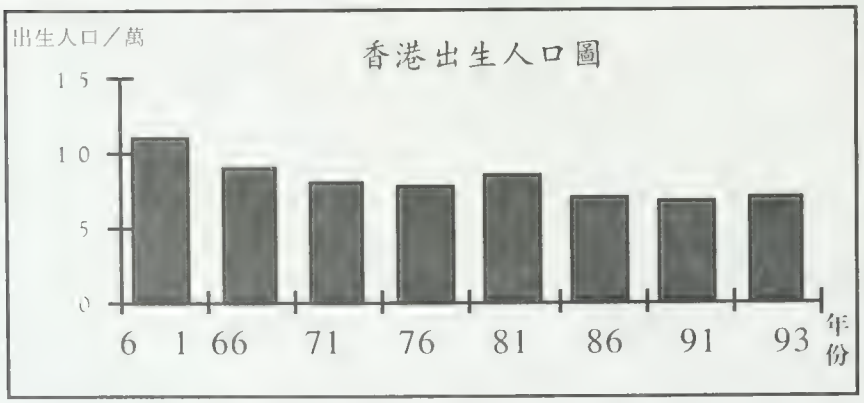
不過農村中亦有限制生育的行動，而且手法亦比較野蠻。陳健民表示，他曾聽聞在一些農村，地方幹部會在半夜入村，強迫孕婦墮胎，並即時進行結紮手術。他說：「國家並沒有授權地方幹部可以這樣做，而這樣做亦沒有任何法律根據。由於法律上的不清晰，再加上中國是政策強過法律，所以才有這種行動出現。」他表示亦有幹部把生育配額出售來牟利。

九七後，計劃生育會否在香港實行？

那麼，九七香港主權回歸中國之後，計劃生育會否在港推行呢？

陳健民表示，由於近年本港的出生率並不高，所以根本不需要推行計劃生育。再加上基本法並沒有說明國內政策必須在本港實施，所以他認為九七後在本港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可能性不大。

而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發言人表示，家計會會根據基本法中的條文辦事。基本法中說明了從香港的實際情況來看，並不需要實行計劃生育，因此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有自願生育的權利。



『性』染污在中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黃雄

中國素稱禮義之邦，崇尚道德，孔孟所倡的儒家禮數更相沿久遠，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聞』就數千年來成了每位炎黃子孫之守則教條，中國共產黨統一中國後，以『共產主義道德』，代替傳統禮制，要求人民作道德上的自我淨化和克制，竭力把性行為在人民生活之外，任何性是人類傳宗接代的本能，大聲疾呼『共產主義萬歲，革命春暖門到家！』並不能把這種『壓抑數人』情欲消滅，近年更有蔓延並國際化大勢各地。

非『性』化統治政策

中共統一中國後，對封建舊社會等制度猛力抨擊，大力提倡男女平等思想思想，提倡自由戀愛，反對買賣婚姻，重養總等陋習，辯證主義和道德主義支配著多數人民的私生活，「革命加愛情」的蘇式調情『一杯水主義』吸引了年青一代，毛澤東對青年的教導：『我是愛情第一，然後才是革命的』，更鼓勵了他們的戀愛公式，到了六十年代，毛提倡『一性兩制』時，中共上下都主張緊的人民的愛情毛澤東，

管理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學說鋒，不斷運動，就是為了要把一個七億人民的個人欲望統治的嚴，把人民都鬥爭了。

在官僚們把數億無產者非性化的試驗中，不平等的性關係激增了，越來越多特權人士利用職權玩弄女性，最典型的例子是是「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在「毛澤東私人醫生」一書中，提到毛澤東性愛紀錄，擁有全國也要擁守的黨軍政治部，亦徵召大批無產階青年，年輕貌美的女供以備毛氏享用，有位朋友，是電工單位的人，當聽到毛住的風流秘聞後，忍不住罵了一句：『他媽的，老子也去幹個女人玩玩！』

近年中國性氾濫的現象，實為嚴重之事，香港大學社會系曾：「性學」表示，其實中國人對性的態度，與西方國家開放的態度，根之為自然之道，如孟子在「告子」一篇中提到「食色性也」，說明了「色」就實如飲食一樣是人的私性，是多麼自然的事情的，「三妻四妾」，「妻妾成群」，都有許多對性自由的描寫，連在中國農民的傳統觀念裏，也指出性可以令人長生不老，只要能懂交合使了男子，「採陰補陽」的道理，在民間都是廣為流傳，甚至

香港三級電影院示以色情誘客為招徠對象

此類吸引遊客的海報常常出現在電影院門外

心目中非想像那樣保守，落後。

性熱潮的真正導火線可以說是從林彪事件開始，隨著文革和毛澤東神話的逐漸破產，西風大吹，人們在幻滅中找尋自我，被始亂終棄的一代知青發動了一場靜悄悄的性騷動，在追求性慾、婚姻上發洩他們過盛的精力。一位曾任地委書記的老幹部多年前在反生活腐化運動中因男女關係被開除黨籍。但以後沒有這樣的運動，他自然不服气，文革中拍桌大罵：『你們看，省委哪個不是三宮六院！』阿Q精神的『和尚摸得，我摸不得？』人皆效尤。漸漸地，北京民主牆提出了性解放，報刊出了性教育和為色情辯護的文章。

開放與性

周恩來在世時，曾有外國記者問他，中國有沒有妓女存在，他肯定地回答有，不過她們在台灣。在當時中國確實沒有妓女的存在，但自七八年中共三中全會以來的開放之風吹襲下，性在大陸便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湧現，娼妓、色情錄影帶、性交易等問題已成為了公開的秘密。

在鄧小平復出後，開放之風有加無減，外商在內地投資設廠，一批批年青人滿懷希望，離鄉別井，攀山涉水湧來沿海一帶城市，夢想他朝可以衣錦還鄉。不知無知少女在「拜金」主義的壞影響下，一脫求快，以身作餌，熊熊「性」火在這批生力軍的催谷下，越燒越旺。中央多次下令徹底掃黃，地方政府亦只是陽奉陰違，因為他們亦清楚知道地方興盛繁榮和她們的「努力」是不可分離的，而且中國人在性方面已經飽受抑壓，一但開放，便一發不可收拾。試問有那一位幹部來到香港，會對滿街裸女雜誌目不斜視，有些更自掏腰包看一看聞名中國的香艷三級片。其實，大陸不應在性方面五十年不變地執著避而不談的態度，以掩耳盜鈴方式去扼殺人類天生的本性。

中共領導人經常說凡事「要符合中國國情」，似乎中國人天生就是一個性保守的民族，性的開放只會令人更腐敗更糜爛；但就香港而言，不少色情雜誌、電影可為廣大社會層面所接觸到，性觀念亦開放，雖然一些風化案偶有發生，但這個社會仍然是文明的，穩定的，並具舉世公認繁榮，如按照中共對性的邏輯觀念，香港當局對性如此縱容放任，社會不崩潰亦應是盜賊滿街天下大亂了，豈知情況恰恰相反。如中國當局再不以開明態度正視性問題，只恐『禁而不能止，為害更大。』

國內遊客到了香港必定看看『香港式』電影

『一間茅屋何所值？父母之鄉去不得。』

國內盲流會否影響九七後的香港？

鄧妙智

香港實現「一國兩制」的目標，隨著主權回歸，將變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可是，不少香港人憂慮大量國內盲流會於九七後湧入香港，造成混亂。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高級講師涂肇慶博士認為，香港人很害怕大陸人的「入侵」，他們的擔憂是可以理解的。

同樣地，普遍國內居民也想著九七年後急於來港的心態。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系講師邵一鳴博士說，國內現時流行一首順口溜「一九九七」，內容謂：「快些到九七，可以去香港。」

國內居民似乎已開始積極行裝，預備跑來香港了。

其實，國內人士來港的主要原因亦只不過有兩點：一是觀光探親，來香港走一趟；二是尋找工作。

提及工作方面，大多數香港人擔心國內人士會取代他們的工作，降低就業機會。不過，兩位受訪講者覺得內地人來港工作不會產生太大問題。

邵博士認為國內人士來港工作，事先需要有關公司申請他們來港，而這些申請是有限額的，故數目可以控制，不會湧入大量外地勞工。

涂氏稱，香港是「亞洲四小龍」之一，香港亦如其他三小龍一樣正面對勞工短缺問題，根本沒有香港人願意投身一些低工資及非技術性的工作，故內地人可以填補這些空缺。

涂氏續說：「現時每天都有一百零五人持單程証來港，若港府與中方能有默契地批出有關人士去填補空缺的話，這批人不單止不會負累香港，反會加促香港經濟繁榮。」

盲流不再是盲流

縱使國內居民來港工作人數能夠受控制，但涂氏卻說不排除在九七之後會出現「盲流」湧入香港現象。

「盲流」一詞原解作「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後來，不管是勞力或非勞力的農民，不論男女老少，未經有關部門批准而盲目到外地流蕩或找尋工作，都稱為「盲流」（資料摘自中國大陸政治術語－－李谷城）

盲流現象源於一九五八年推行「大躍進、人民公社」，有些生育政策後，農民生活苦不堪言，故紛紛往外地謀生。

八十年代再次出現「盲流」，有的是計劃外生育的子女向外逃避當局追查；有的卻是為了找到入息較高的工作。

現時中國沒有一個準確的「盲

邵博士認為內地人來港工作不會構成太大問題。

民工若不清楚香港情況，他們不會貿然來港。

流」數字，報載起碼有三千萬人。據廣東省第四次手工業總匯調查資料，單在廣東省內，暫時性遷移人口於一九九零年內已佔百份之五點一四，人口數字約一百二十萬；比較起一九八二年的百份之零點五二增長了不少。

據邵博士說，現時國內已少採用「盲流」這個名詞，原因是那些農民是有明顯計劃的外流，並非盲目外走；而內地已統一稱為「民工潮」。他說：「所謂『人望高處，水望低流』，那些農民再不是盲目的離開他們的鄉村原居地了。」

農村人民不識途

目前中國農村出現剩餘勞動力過多現象，估計到公元二千年，其數字將達二億人之多。雖然數字是那麼驚人，邵博士卻認為那些民工不會於九七年後大量流入香港，如果發生，他們現時也可偷渡來港，事實有九七前後之分。

他說：「現時邊防是由香港警察把守的，九七年之後相信可以維持現狀。」

涂博士認為農村的人民不會貿然來港，若他們不清楚香港的情況，他們多不敢鋌而走險。

反而言之，最有可能循非法途徑來港的人往往是那些住在經濟特區的居民；原因是他們經常與香港人接觸，熟悉香港的情況，甚至可以勾結港人搭路。

邵博士很認同此說法。他舉出一個例子，基於香港有親戚的關係，一些來自增城的居民能夠承包整座未入伙的大廈清潔工作。

政經變化生盲流

邵氏謂，除非香港有重大的改變，而這些改變是預計不到的，這才有可能會出現所謂「盲流」現象。

他解釋道：「若然中國內政發生劇變，人民逃亡，或邊防軍採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這才會有盲流湧入香港。」

據涂博士說，其實內地人一般也不願離鄉別井，去面對一切不明朗前景。長遠來說，只有廣東省經濟發展與香港拉近，國內居民流入香港的情形才會減少。可是，涂氏認為未來數年內，國內經濟發展仍未能與香港看齊。

涂博士預測，若果國內人口湧入香港情況果真出現，香港所面對的問題也不少。

他說：「那些找不到工作的民工，如他們沒有錢回鄉，他們只有整天流離浪蕩，有的甚至為了生活而去搶劫，造成一片混亂。其次是居住問題，他們會因不能負擔租金而露宿街頭，變成社會的擔子。」

至於解決方法，涂氏認為有關政府很難控制，就如美國政府沒有辦法制止墨西哥人非法移居加州及德州情況一樣。

入境問題待磋商

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與港英政府絕少提及九七年後香港出入境問題，涂博士覺得及早商討有關問題是迫切的。

他謂：「縱使這不是最首要商討的問題，但其重要性是會隨著九七接近而增加的。」

涂氏提出一個具體問題：將來九七年後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是否會隨之消失或與中國有關機制合併呢？目前並沒有清楚說明，而他個人認為最有可能的是中國「外交部」取代之。

總括而言，九七年後，盲流會否大量湧入香港的問題仍屬未知之數，但若中國大陸政局穩定，並有完善的人口控制政策及駐有足夠邊防軍，香港仍是一個安樂窩，市民仍能過著的「馬照跑、舞照跳」多采多姿的生活方式。

治世不一道 便國不必法古

「九七」後香港的公共假日如何修訂？

梁潔晶

香港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中國，距時不足三年，許多問題都有待解決，其中為一般市民茶餘飯後談資的，就是九七年後，香港法定假期將有何改變？

預委會文化組秘書吳祥玉說，有關香港法定假期的制定，文化小組正在討論中，吸納各方建議，雖然意見未獲統一，但小組成員已存共識。

修訂傾向簡單的做法

預委會文化小組成員吳靄儀教授表說，假期的修訂雖然尚未定案，不過，大致上都會傾向簡單的做法。

雖然，現時中國只有七天公眾假期，包括元旦一天、春節三天、五一勞動節及十月一、二日的國慶假期，但他表示香港的公眾假期將不會有太大的變動，相信仍會維持十七天假期不變，以免產生混亂。

他解釋為了體驗一國兩制，所以不會仿照中國的公眾假期，實行按照原來香港人的生活方式。

建議有效期一年半

不過，他說：「有關建議只適用於九七年七月一日至九八年底，為期一年半，至於九九年以後的法定假期，則會由特區政府自行制訂。」

他表示，文化小組負責提議，外交由九八年委立的籌委會作最後決定。他解釋，文化小組建議有效期只有一年半，原因是特區政府於九七年七月一日才成立，所以不可能太遲才作決定。

雖然公眾假期可隨時更改，但他說：「不能今天更改，明天實行，所以必須有『預告期』，預先通告市民。」

他又說，若香港乃國際或市，或有實行前，必要向工商業機構作預先通知長假日銀行的辦公時間，當局必予足夠時間印行曆本。因此，他認有關建議宜及早作決定。

至於特區政府會否採用小組的建議，他表示不得而知，小組只是負責建立有關公眾假期的建議書，最後由特區政府自行考慮。

取消殖民地色彩假期

經過小組一諭討論，會員均認爲「十．一」國慶兩天假日已在基本法中清楚寫明，任何人都不得更改，所以各人應同意接受。至於七月一日香港特區成立，紀念回歸祖國，香港市民亦覺合理。由於香港於九七年後，不再是英國殖民地，所以他們贊成取消英女皇壽辰，此點亦不難理解。

另外，小組認爲應以抗日勝利戰爭紀念日取替原有富殖民地色彩的重光紀念日。

吳氏解釋，取消重光紀念日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戰勝國的中國政府原先希望收回香港，但英國搶先登陸香港，並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過來，恢復香港統治，在「米已成炊」的情況下，當時中國未能收回香港，故此，小組正考慮取消是日假期。

但有些市民則誤解取消紀念日的原因，他補充說，實際上，小組不想有英國恢復統治香港的紀念日。所以，爲了避免引起市民誤會，經過考慮後，決定以廣義的觀點紀念日本戰敗，並慶祝中國及全世界打敗法西斯主義，從而出現了抗日勝利戰爭紀念日。

佛教徒爭取佛祖誕假

其實，民間已有不少團體正提出意見，其中有工會要求「五．勞動節」；婦女界則希望「三．八婦女節」成爲法定假期。

另有佛教人士提議安排佛祖誕假期。吳教授稱六百萬人口的城市，佛教徒比例較高，而且佛教亦是中國傳統文化重要一環，再加上佛教比基督教於中土還要根深蒂固，現時則有聖誕節及復活節多天假期，因此他們的要求亦屬合理的。

他個人則認爲佛祖誕是有趣的想法，同時希望假期能夠多元化，並且在基督教大學工作多年的他，亦想體會別人的想法。因此他認爲佛教徒有提出要求的理由，而且這樣又可把多年傳統文化流傳下去。

他說，各建議都有其本身的道理，所以作決定會較爲困難，最後必須加以衡量。

教師節是否值得考慮

對於有教師團體要求有一個屬於他們的假期時，他本人十分贊同，他認爲藉教師節，可以讓大家對教師們表示尊重及敬意。他認爲若假期不影響公衆，便值得考慮，他並提議在九十天的學校假期中抽調出來，當作學校的特別假期。

但他對於討論這決定實在言之過早，因爲它必須交由特區政府作最後決定。

實踐五十年不變承諾

其實，廣大市民對於九七後的公衆假期皆有不同想法及意見，其中一位被訪者黃先生表示，制訂假期多少，不是問題的癥結，而是政府應盡早向廣大市民宣佈。再者，也不應作太大的修訂或改變，以實踐香港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當然，有部份假期是不得不改的，例如英女皇壽辰。

吳氏表示，假期基本上是爲了享受及歡樂，因此不用太執著那一天是假期。

他又說由於九七上半年仍由英國政府統治，所以相信英女皇壽辰仍維持爲假期，加上其它新建議，他估計市民於九七年將會享有三天額外假期。

預委會文化小組成員吳清輝表示假期會按照原來香港人的生活習慣。

公務員學習普通話便於溝通

「九七」臨近・老死應相往來

華莉珍

計時不到一千日，九七年七月一日即將來臨。雖然中英現時仍未就公務員過渡安排達成協議，但有很多公務員已自行籌劃，為順利過渡鋪路——學普通話便於與中國官員溝通。

九七主權移交，香港的宗主國亦隨說英語的大英帝國轉變為講普通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本地公務員若要於九七年後，繼續留任，在官場上打滾，又豈能不懂普通話等？因此，公務員學習普通話實為大勢所趨，無可避免。

開辦課程為滿足需求

自八二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中港兩地的接觸隨著「九七」的逐步迫近而日趨頻繁。公務員接觸內地官員、移民及商人等的機會增多，使用普通話的機會也多了。例如，入民入境事務處職員便經常接獲說普通話的查詢。有見及此，公務員訓練處於八二年度開始開辦普通話課程，以應付公務員工作上的需要。

普通話課程，由開辦迄今已有十多年。一直以來，公務員對普通話課程的需求有增無減，而越接近九七，有關的需求越殷切。公務員訓練處發言人笑說：「十多年前，沒有多少個部門需要普通話課程，但近年情況剛好相反，沒有一個部門說不需要普通話課程。」

因此，近年該處不斷增加普通話班的數量及名額，以供更多的公務員修讀。

擴展課程卻供不應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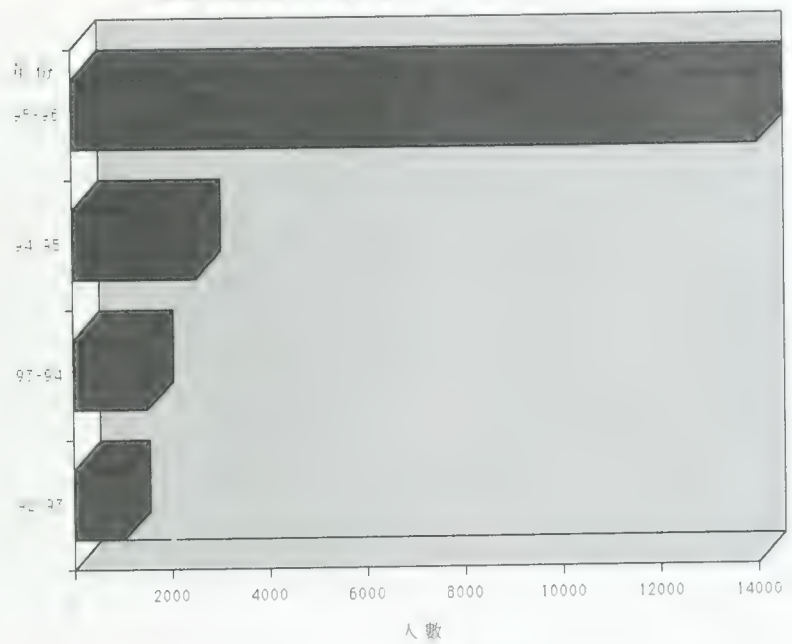
雖然公務員訓練處積極擴大普通話課程的規模，但該處仍受制，如班房不足，該處開辦的課程仍未能滿足所有公務員的需求。就以本年度才開辦的漢語拼音課程為例，申請報讀的公務員人數近一千四百多名，但可供修讀的名額卻只有八十八名（已因反應熱烈而增加）。

公務員訓練處發言人強調，這是個很特別的例子，一般來說情況不會這樣，但他承認有供不應求的情形存在。

既然供不應求，如何挑選修讀者呢？該發言人表示，會參考各部門的推薦書，甄選最有需要的公務員修讀有關的課程。

此外，公務員訓練處下年度計劃與大學合辦普通話課程，其中包括浸會大學。有關大學只負責提供導師及班房，而課程設計仍會由該處負責。該發言人相信，計劃可助解決該處班房短缺問

修讀普通話課程學員的數目　（資料提供：公務員訓練處）



（93－94）公務員訓練處所開辦的普通話課程的種類

課程	報讀資格	參加人數
基本普通話（80小時）	薪級表33或以上	639
基本普通話（100小時）	海外公務員	93－94年度沒有開辦
高級普通話（60小時）	薪級表24或以上	40
實用普通話（42小時）	薪級表33或以下	204
職務普通話（42小時）	薪級表33或以下	574
漢語拼音（18小時）	/	94－95年度才開辦
處理普通話電話查詢的技巧（1日）	有需要的公務員	94－95年度才開辦
政務主任基本普通話	政務主任	23
政務主任高級普通話	政務主任	25

（資料提供：公務員訓練處）

題，令公務員普通話課程得以進一步擴展，預計下年度可讓一萬四千名公務員修讀普通話課程，較本年度增加超過四倍。

課程實用且種類繁多

公務員訓練處開辦的普通話課程種類繁多，有基本普通話，高級普通話，實用普通話等。課程內容包括如何介紹政府架構及其部門的工作，及對熱門時事題目的對答等。此外，該處會定期檢討及更新課程的內容，以切合實際的需求。

課程的選材主要針對不同薪級的公務員的工作需求，但亦會針對個別部門的需要，如特意設立職務普通話，讓來自同一部門的學員，學習該部門專有的詞匯。導師更會事先與學員接觸，了解他們日常會遇到什麼獨特的詞匯，以便設計課程的教材。

公務員參加這些課程是不用繳費的，並可利用上班時間來上堂。該發言人套用大陸的說法，稱這為「脫產訓練」。

此外，該處於八五年起開辦了認寫簡體字課程。

不容置疑，公務員訓練處開辦的普通話課程會受到公務員歡迎的。公務員團體華員會會長黃河表示，現時部份公務員在接觸市民時需要使用普通話，因學習普通話有助公務員與部份市民溝通，改善服務。他歡迎政府開辦這類課程，可惜名額有限。

試想九七後，公函會否採用簡體字？官方語方會否是普通話？這問題須由特區政府解答了。但黃河認為，若用行政指令，規定公務員九七後要使用簡體字及普通話，太過形式化了，並不恰當。他認為文字及語言的演變，不能強求，應順其自然，循序漸進。

其實既然學習普通話已蔚然成風，不論九七後，普通話會否成為法定語言，其地位早已被肯定了。廣東話，普通話及英語很快便會鼎足而立，三分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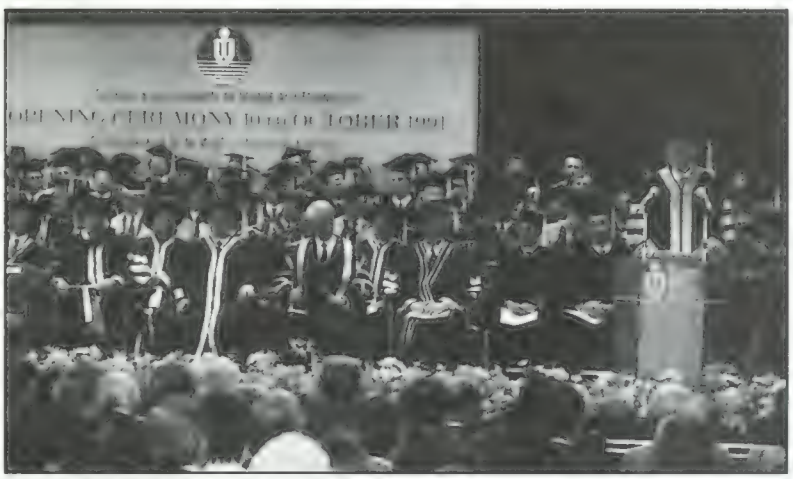
公務員正在專心地上普通話課。

學位長期不受承認，可能會有轉變

承認大陸學位問題眾說紛紜

羅健薇

拿著一紙大學畢業文憑一向被認為是求職的保證。但在現今學歷評審制度下，很多非英聯邦國家，尤其是中國和台灣所頒授的大學學位都不被承認。隨著九七年主權的移交，中國大陸學位長期被忽視的現象相信也會隨之而有所改變。



學術評審應該以課程的水平為依歸

殖民地色彩的評審制度

目前香港學歷評審制度被批評為不公平和沾滿殖民地色彩。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梁秉中謂現時學術評審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各專業團體自行考核執業人士的專業資格，政府採取尊重及不干預態度；第二，全面追隨英式制度，只承認英聯邦學位。在政府招聘員工時，英聯邦學位持有人的學歷將會予以考慮和給予相應的待遇。雖然這只是政府的招聘標準，但很多私人機構都會跟隨，形成很多非英聯邦學位被拒諸門外。梁氏說這種全英式學位評審在三十年前尤為嚴重，雖然在十五年前稍為放鬆，承認一些高水準的美國學位，並同時把水準過低的印度及孟加拉學位剔除，但整體而言，改善程度仍然不足。

香港浸會大學政府及國際研究學系講師丁偉博士認為政府只承認英聯邦學位在從前政府運作上是有其「實際」作用。因為這可以確保申請人能達到若干英語水平，以便處理全以英文書寫的政府公函。但丁博士認為隨著九七的來臨，使用中文日益普及，高水準英語的要求可以放寬，而這個不公平的做法也需要檢討。

梁院長指出本港不完善的學位評審制度衍生兩個問題。第一，專業團體在審核學歷時多採取保護主義，維持本身利益，不努力改善行內學術水平，而另一方面，偏袒英聯邦學位的做法又實在不公平

評審制度應和政治脫鉤?

香港成人教育協會秘書張民炳認為學術評審不應該和政治及地域掛鈎，應以該課程的學術水平為依歸。而香港浸會大學學務副校長白智理教授認為評審學位時應該客觀地考慮各方面的需要，該課程能否迎合社會上對人才的需要。學術水平能否和海外大學競爭，以及該大學的資源和財力能否配合課程的實踐。

倘若要達到客觀、公平的標準評審大陸學位，有關學術評審機構需要委派大量學者和專家到中國的大學進行深入考察，礙於資源限制，梁院長認為這是不可能達到的。所以更實際的做法是以香港為本位，就著本身對該專業的學術水平，來訂定考核標準

張民炳認為現時考核大陸學位的最大問題是兩地教育概念的差

館藏文獻加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I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

同。大陸的大學課程政治味濃厚，課程包含著共產黨的宣傳和教育。此外，大學的日常運作很大程度上受著政府管制，以致學術上過於國內性，太少海外交流和參與。白教授認為對大陸大學的認識太少是導致學術評審困難的主要原因。他說：「雖然我們能通過學術交流而增進彼此認識，但大陸大學數目超過一千間，且良莠不齊，很難對它們有深入認識，但無可否認，有些大學的課程水準十分高。」

目前大陸的學術評審工作由國務院轄下的學位委員會負責。根據八一年制定工作。《關於學位授予的原則和辦法》來指導學術。評審該委員會由全國著名科學家和學者以及國務院有關部委的負責人兼任，由國務院任命。

什麼機構去評審學位？

現時本港似乎缺乏一個確定的專業組織去評審大陸的學位。香港學術評審局只能評審本港大專教育，而沒有權限去評審其它國家，包括中國大陸的學位。張氏認為隨著兩間理工和浸會學院升格為大學，可以自行評審學位水平，而香港學術評審局的工作範圍逐漸收窄之際，該局的工作取向需要轉移，要更多的面對國際學術界。他說：「隨著香港在經濟上更多的國際合作，香港學術地位更需要維持鮮明的水準。」他提議香港要培養足夠評審學位的人材，並且和海外學術機構保持緊密聯系。

另一方面，學術評審局則強調它在學位評審中的「諮詢」角色一向政府和僱主提供有關該學位的資料及意見，承認與否完全取決於僱主。傳統上，由於西方國家，如美加、澳洲的學術水平較高，和香港教育制度較為相似，因此政府較易對該等學位作出評審，使人覺得政府無條件接納這些學位。其實，學術評審局在考慮每一個學位時都是獨立處理的。白教授也同意評審局在學位承認問題上，只可扮演「廣泛」(general) 的角色，向僱主提供意見，實際對學歷的要求和取捨，則要由市場因素決定。例如在英文程度上，某些英文學校會對求職的學位持有人作較高要求，相反，對工程人員的英語水平則較低。

本港大學生九七後將要面對更大挑戰

白智理教授認為無需要再評審已承認的學位

無需要再次評審英聯邦學位

對於現時被承認的英聯邦學位，白氏認為九七後無需要再次評審。因為自從1990年學術評審局成立後，所有評審工作已脫離政府架構，改由各方面專家和學者負責，加這個委員會也包括來自中、台兩地學者，所以是有足夠權威性。此外，張氏恐怕若因政治因素而再次評審已承認的學位，會招致其它地區的報復，取消承認本港頒授的學位，因而影響本港學生往外地就業的機會。因此張氏認為若要達到控制學術水平的目的，現時的定期審核已經足夠。

鳴謝：

丁偉　　邵一鳴
曹捷　　孫國權
黃煜　　劉慧卿
吳昊　　程介南
雷曉　　譚耀宗
陳玉璽　　梁廣昌
梁偉雄　　黃毓民
吳清輝　　陳健民
卓伯棠　　梁燕紅
沈鑒治　　岑逸飛
張結鳳　　游紹永
關玉慈　　李鵬飛
陳龍生　　馮檢基
譚焯明　　任羨寧
鄭偉鳴　　劉漢銓
孔文添　　雷競旋
張民炳　　馮偉光
梁秉中　　曾鈺成
白智理　　李陳佩慈
翁松燃　　南華早報
涂肇慶　　華僑日報

〔排名不分先後〕

With Compliments of

LUCKMATE INVESTMENT LIMITED

香港九七啓示錄
編委會

督印人　：陳玉璽
顧　問　：陳良光
總編輯　：黃頌文
副總編輯：陳鳳麗
　　鄧妙智
美術主任：陳婉儀
廣告主任：李美莉
發行主任：曾志康
圖片編輯：黃志釗

編輯：

黃凱蒂　謝佩怡
王慧慈　楊潔儀
陳潔貞　陳文超
林育慧　李珮華
葉富喜　王　岑
曾靄英　陳健民
黃　雄　梁英傑
梁潔晶　華莉珍
羅健薇

一九九五年二月

媒介縱橫 94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學系・媒介縱橫´ 94 之香港九七啓示錄
非賣品